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研究(第 2 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類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NSC 99-2410-H-004-033-MY2
執 行 期 間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劉心華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張翰豪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程婉瑜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劉怡庭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馨慧

公 開 資 訊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

中文摘要：新歷史主義指出，歷史基本上是由事件的論述所構成，但卻常常呈現斷層，主要是受到政治權威、社會主流價值及文化意識的影響。法國著名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為了添補斷層，人們應透過各種不同角度的論述去還原歷史。換句話說，歷史並不只是對史實的單一性記載，當然也不是單純對過去事件的紀錄；應該跳脫官方的單一性、權威性記載，尋求多元的社會論述。另一方面，法國哲學家德西達(Jacques Derrida)也指出：「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透過這種結構，人們可以對整個世界再理解，以彌補歷史斷層的事實遺失。因此，文學中的自傳體作品與回憶錄成為研究特定歷史時空的另一種佐證；藉由它們的論述，人們才可能拼貼出各時代完整的社會圖像及文化氛圍，此乃文學的歷史性功能。

俄羅斯的自傳體與回憶錄作品起源很早，但仍然受到歐洲文學規範的影響，一直到十八世紀才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獨特形式。俄羅斯傳統的女性作品主要是力圖從父權定義的社會模式中解放出來，以零散的、沒有中心的、不用押韻的、隨興的語言形式，深刻描述女性的生活故事（Domna Stanton 1984:3-20），重新描述女性與「他者」有關（而非分離）的自我，最明顯的就是女性自傳體詩學。

二十世紀初的蘇維埃革命改變了俄國的社會圖像及文化氛圍，權威意識及政治迫害充斥整個社會體系；此時期的俄羅斯女性自傳主要以揭發鎮壓者的不公不義為體裁，並以道德行為表達對受迫害者的關心與同情，使崇高的文化與價值得以繼續保存；同時，也持續著反抗男權為中心的話語表述，呈現女性在當時社會追尋自我的艱難歷程。從這段歷史的女性文學來分析，這類女作家的作品大致可歸納為四種類型：革命者、政治犯、文化保護者與自我追尋者。

本研究計畫將先蒐集相關學者的論述，進行分析、整理和歸納，建構該議題的理論，包括「自我」與「他者」的相關理論、俄羅斯自傳體書寫傳統與特色、西方與被殖民國家女性自傳體小說的書寫特色…等。其次，再依據相關理論，對各種類型的主要文本範例，進行分析、論述及整合，進一步將其論述投射到歷史的斷層，跨越政治威權，回歸社會真相。

中文關鍵詞：「自我」與「他者」、女性自傳體、文學寡婦、女革命家、回憶錄

英文摘要：Russian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had followed the style of European literature until the 18th century

as they cultivated their own style. By the same route, Russian traditional woman literature mainly aimed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social model based on the patriarchy； they tried to re-define the gender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the other. The poetic of women autobiography is the case in point.

Soviet revolution did radically change the Russia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vents of witch hunt happened. At this period of time, Russian women autobiographies mainly exposed the events with ethos and pathos to fight against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In the mean time, they took the literature to display their struggle for self-identification in the man-dominant society. Russian women's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in the 20th centu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ose of woman revolutionist, of prisoner, of cultural conservator and of self-pursuer.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first probe various points of view from different scholars, then analyze and organize them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loiting the theory of 'self' and 'the other', the tradition of Russia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lso it will dea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in the West concerning post-colonialist scenario and etc. Secondly,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the contexts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of different genres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ies. Finally,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span political authoritative narration and to reveal the truth of history in that period of time.

英文關鍵詞： 'Self' & 'Other', Woman Autobiographies, Widow of Literature, Woman Revolutionists, Memoirs

附件一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

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033-MY2
執行期間：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心華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第一年）劉怡庭、黃馨慧
（第二年）張翰豪、程婉瑜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1 份：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20

目錄

報告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II

報告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III

報告內容……... 1

參考文獻……... 56

計畫成果自評…… 59

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61

報告中文摘要

新歷史主義指出，歷史基本上是由事件的論述所構成，但卻常常呈現斷層，主要是受到政治權威、社會主流價值及文化意識的影響。法國著名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為了添補斷層，人們應透過各種不同角度的論述去還原歷史。換句話說，歷史並不只是對史實的單一性記載，當然也不是單純對過去事件的紀錄；應該跳脫官方的單一性、權威性記載，尋求多元的社會論述。另一方面，法國哲學家德西達(Jacques Derrida)也指出：「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透過這種結構，人們可以對整個世界再理解，以彌補歷史斷層的事實遺失。因此，文學中的自傳體作品與回憶錄成為研究特定歷史時空的另一種佐證；藉由它們的論述，人們才可能拼貼出各時代完整的社會圖像及文化氛圍，此乃文學的歷史性功能。

俄羅斯的自傳體與回憶錄作品起源很早，但仍然受到歐洲文學規範的影響，一直到十八世紀才逐漸發展出自己的獨特形式。俄羅斯傳統的女性作品主要是力圖從父權定義的社會模式中解放出來，以零散的、沒有中心的、不用押韻的、隨興的語言形式，深刻描述女性的生活故事（Domna Stanton 1984:3-20），重新描述女性與「他者」有關（而非分離）的自我，最明顯的就是女性自傳體詩學。

二十世紀初的蘇維埃革命改變了俄國的社會圖像及文化氛圍，權威意識及政治迫害充斥整個社會體系；此時期的俄羅斯女性自傳主要以揭發鎮壓者的不公不義為體裁，並以道德行為表達對受迫害者的關心與同情，使崇高的文化與價值得以繼續保存；同時，也持續著反抗男權為中心的話語表述，呈現女性在當時社會追尋自我的艱難歷程。從這段歷史的女性文學來分析，這類女作家的作品大致可歸納為四種類型：革命者、政治犯、文化保護者與自我追尋者。

本研究計畫將先蒐集相關學者的論述，進行分析、整理和歸納，建構該議題的理論，包括「自我」與「他者」的相關理論、俄羅斯自傳體書寫傳統與特色、西方與被殖民國家女性自傳體小說的書寫特色…等。其次，再依據相關理論，對各種類型的主要文本範例，進行分析、論述及整合，進一步將其論述投射到歷史的斷層，跨越政治威權，回歸社會真相。

關鍵詞：「自我」與「他者」、女性自傳體、文學寡婦、女革命家、回憶錄。

報告英文摘要

New Historicists articulate that history is basically understood through its context on the evolution of facts; however, it also shows broken-point in the way of evolution due to interference or distortion by political authority, dominant value system and cultural ideology. According to Foucault's point of view, it should take an approach both on theory of the limits of collective cultural knowledge and on technique of examining a broad array of docu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pisteme of a particular time. New Historicism is claimed to be a more neut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events, and to be sensitive towards different cultures. In other words, history can hardly be true only by examining the official documents. French philosopher, Jacques Derrida, says that there is no world outside the text of words. Thus, literature is itself a structure of meaning in words, through which people realize the lost fact in history. Obviously it is the historical role of literature to present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ictures in the ages, especially those of autobiography and memoir.

Russian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had followed the style of European literature until the 18th century as they cultivated their own style. By the same route, Russian traditional woman literature mainly aimed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social model based on the patriarchy; they tried to re-define the gender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the other. The poetic of women autobiography is the case in point.

Soviet revolution did radically change the Russia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vents of witch hunt happened. At this period of time, Russian women autobiographies mainly exposed the events with ethos and pathos to fight against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In the mean time, they took the literature to display their struggle for self-identification in the man-dominant society. Russian women's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in the 20th centu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ose of woman revolutionist, of prisoner, of cultural conservator and of self-pursuer.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first probe various points of view from different scholars, then analyze and organize them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loiting the theory of "self" and "the other", the tradition of Russia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lso it will dea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in the West concerning post-colonialist scenario and etc. Secondly,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the contexts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of different genres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ies. Finally,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span political authoritative narration and to reveal the truth of history in that period of time.

Keywords: "Self" & "Other", Woman Autobiographies, Widow of Literature, Woman Revolutionists, Memoirs.

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研究（期末報告）

壹、前言

人類的性別意識可以從生理層面自我認知的性（sex）及社會層面相互意會的性別（gender）來探討。從社會層面來看，性別意識是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男女特徵與期望；這樣的性別特質顯然會隨著時空的轉變而改變。因此，性別特質的流動性證明了男女特質並非完全是天生的，人爲的外在環境深深影響著男女之間的行爲差異與角色認知。顯然，生理的性認知一般是不變的；而社會性的性別意涵卻會隨著時空背景的轉移而演化。

相對於生物性別，一個由社會型塑出來的性別意識，其特質是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男女特徵與期望；是由共同文化空間的人們生產或再生產出來的男女特徵。也因此，這些性別特質會隨著時空的轉變而改變；不同的時代、社會與國家塑造出的性別特質也不同。顯然地，意識不僅由彼此意會存在的外在環境所型塑，也會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轉移而流動；意識性別的流動性證明了男女特質並非生而不同，人爲的外在環境深深影響著男女之間的行爲差異與角色認知。

社會心理學家則認爲社會針對不同性別的人制訂一套性別特質，這套性別特質賦予男性與女性不同的權利、義務、行爲模式與心理發展；隨後當人類了解自己的性別與性別特質，便開始完成「角色接受」的過程。由此可見，性別角色的實現是伴隨著社會化的過程而展開的，社會化的實質功能即是「角色扮演」，亦即學習領會他人的期待，並按照這種期待從事角色認定及行爲；其最終的目標是完成「客我」的身份認知。[1]具體的說，社會化不僅是一個人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變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內化社會價值標準、學習角色技能、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無論男性還是女性，人類的身體已經被符碼化地置於社會網絡及文化之中，並且被文化賦予意義。因而，性別的研究就必須從生理、社會及文化的多層面去探討，亦即從一個多元的網絡關係脈絡中才能窺其真正的意涵。

檢視人類社會的性別史，父權制的產生雖然根源於天生的「兩性關係」，再

[1] 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184。

從「性」的差異轉變爲「性別的差異」，最後則轉爲「性別意識的顛覆及不平等」。女性自出生開始，其性別意識就受到父權社會的性別秩序所規範。傳統「父權制」不僅僅只是指以男性家長爲中心的家庭制度或親屬關係制度，而且也是指「以該制度爲中心，向外擴張而建構的生存體系、生活方式及社會制度」。從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這種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體制，同時也在人類文化史上顯現了男性絕對統治地位的文化體系。表面上看來，這種文化體系似乎只是一種「男人爲中心，女人爲邊陲」的關係制度；而深一層來看，它已把女性排除在社會文化體系之外，並不存在女性的「邊陲地位」。

在自然界與自然狀態中，「性的差異」主要是以身體與生理結構的差異爲基礎。在人類社會與文化初建之時期，支配權力的形成主要決定於暴力及經濟力的擁有，而天生條件上，男性在肉體及生理上具有其優勢，也相對擁有了決定社會結構及秩序規範的權力；男性利用其天生的優越性，在整個文明發展過程中，持續擴大其支配地位。除了將女性肉體客體化並佔有外，進一步也對非肉體的生活領域客體化及佔有（一方面以對女性肉體之客體化及佔有爲基礎，另一方面以更複雜之文化象徵形式及觀念形式將上述客體化及佔有繼續擴大）。至此情境，假如要顛覆、解構以男人爲中心的社會文化，就必須先顛覆男性肉體對女性肉體的支配結構。基於當代人權的意識，這種統治模式是應該深入加以揭露，並受到嚴厲的批判，尤其是針對男人統治模式的權力制度及知識系統集中批判。

客觀上，人類文化應該是由兩性意識的互動及其發展而形成的生活體系；是根據最原始及最自然的生物學意義，在兩性生存關係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對人類文化史的研究指出：「食物交換」及「性的交換」在人類文化的發展上佔有極重要的功能；因爲「性」的關係演進，人類才從原始生活向社會文化過渡，進而使文化不斷更新、複雜化及精緻化；簡單地說，人類社會才逐漸以越來越複雜與象徵化的文化形式掩蓋了原始的兩性關係（文化越發展，人類越遠離與自然的關係）。而也因爲這種發展，才使人類「驕傲自豪地」脫離動物那種原始的、毫無規範及禁忌的性行爲，終於

完成兩性關係的文明化。吊詭的是，這種遠離自然之過程，表面上推進人類的文明，卻在兩性關係的調整過程中，實質建構了男性的絕對統治地位並排除了女性的參與角色及地位。關於這種無奈，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感嘆地指出：「女人並非天生的，而是變出來的」。其言下之意，女人已非原來參與文明建構之女人。就父權主義之後，「女人」一詞的概念都是由男性中心主義之文化所界定出來，變成了男性的附屬物，簡單的說，是一種男性爲維護其統治地位所創造出的文化迷思。

二十世紀興起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認爲，由於女性共同的性別及社會角色的差異性，帶來的生理體驗與心理體驗有別於男性；在男權文化中因共處的邊緣文化地位而形成共同的女性文化，當有機會藉寫作表達自我時，她們首先便會確認自我在世界的位置。這種自我求證的過程必定會伴隨對男權主導的社會價值觀提出批判和顛覆，而同時在此世界發出另一種聲音。二十世紀以來俄羅斯女作家透過寫作不斷地自我認知、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期重新想像女性、建構自我的主體性；尤其從女作家們的自傳體書寫更可看出她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本研究計畫擬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俄羅斯女作家自傳作品中探索這些女作家自我追尋的足跡。

貳、研究目的

自廿世紀七〇年代以來，女性主義學者致力於重新詮釋女性作家作品。在揭發父權文化特權及挑戰男性傳統規範時，發現最有成果的就是女性自傳體詩學。女性自傳作品不僅透露了男性傳統對女性題材的忽視與排斥，同時重新描述了女性與「他者」有關（而非分離）的自我；它奮力從父權定義的模式中解放出來，並且以零散的、沒有中心的、不用押韻的、隨興的語言形式，深刻描述了女性的生活故事（Domna Stanton 1984:3-20）。當然，該時期的女性自傳作品仍然集中在西歐和北美，大致是屬於第一世界的文化和受到第一世界殖民或壓迫的對立者，以及他們之間相互影響的範圍。至於俄羅斯、蘇聯和東歐的作品則不屬於女權主義學術研究的主流，一般被放在殖民者／被殖民者的關係之外。這些文本究竟應定位在哪個領域？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探討。

如同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揚棄歐洲文學的規範，這些女作家似乎也抗拒將自己的作品納入西歐的作品之中，強調俄羅斯文學的獨特性和優勢。若要深入瞭解俄羅斯女性自傳體作品，除了分析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創作之外，還需要特別探究蘇聯時期女性自傳體作品所反應的獨特模式。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自己合併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不僅征服非俄羅斯民族，並且疏離了被剝奪基本人權的俄羅斯社會。俄羅斯女性的自傳書寫方式經常揭發或反對鎮壓者的不公，並以道德行爲表達對其他受迫害者的關心，使崇高的文化與價值繼續保存；或是反抗男權爲中心的話語表述，追尋女性自我的艱難歷程。歸納起來，這類女作家，大致可分爲四種類型：革命者、政治犯、文化保護者與自我追尋者。

革命類型女作家的產生，主要是源自十九世紀末與廿世紀之交的社會背景；她們在推廣女性教育和爭取女性工作機會數十年後，將自己冒險經驗的故事發表在報章雜誌上，一方面作爲她們新角色（醫生、律師、工程師、老師和革命者）的證明，同時也作爲鼓勵其他女性進入公眾領域的見證。顯然地，在所有的女性職業自傳中，最有影響力應該就是女性革命者的傳記；她們的生活故事不僅可看作服從當時革命黨的重要歷史文獻，更可擴大爲悠久的俄國反抗式（反對沙皇統治）自傳體傳統。她們這種特殊爲服務革命的文本，確實在當時扮演了啓發性意義：以堅定自我犧牲的紀錄，爲當時社會建立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模式。她們將自傳當成世俗聖徒的生活紀錄，追求真理朝聖者的證明書。她們通常將自己刻劃成品格高尚、利他主義、完全獻身革命的女革命者。然而，當她們將自傳當成「反向書寫」的幻想時，「公眾我」和「清晰的使命感」容易將她們的生活故事簡單化和系統化（Babara Helt 1987:68-69），但在無形中卻遺忘了「女性我」。

這些女傳記作家通常將自己步入地下政治的抉擇歸因於追求女性解放。例如：薇拉・拉蘇莉琪（Вера И. Засулич, 1849-1919）認爲革命的幽靈把她從成爲家庭教師的命運中解放出來，讓她可以和男性平等。當她們在描述個人故事時，往往不能坦白的表現自我，容易根據一般忠誠男性革命家的模式去編造自我的形象。在自傳中，背負著階級鬥爭意識與對人民的關心，她們不得不忽略自我的性別經驗，或是用高尚的奉獻取代個人生活的敘述，也因此，傳統家庭角色往往被拋棄或次於革命工作。這種沉默的附屬關係被痛苦地寫在女權活動家亞

歷珊德拉·柯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的自傳裡。比起任何其他的女革命家，她的例子是既典型又諷刺的。她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激進份子，曾短暫地成爲新蘇聯社會最傑出的女性革命家。在她的文章和小說中，柯隆泰企圖將政治革命與個人性解放連結在一起，夢想在蘇聯社會建立一個性誠實、享樂和個人自主的藍圖。當她在 1926 年寫《一個被解放的女共產黨員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時，她已經因爲自己的一些政治錯誤，而被外派到挪威當大使。在自傳中，她企圖將這種想法表達出來；然而，隨後而來的批判令她不得不刪除個人生活與想法的一些片段。她必須犧牲自我的私領域、尊崇黨的一切，以第一人稱複數－－我們－－的形式取代第一人稱單數－－我－－的主張。

第二種類型是政治犯女性自傳體回憶錄。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當蘇聯政府積極建立嚴格的排他性正統時，同時也製造出一種特殊的監獄經驗，以及由許多政治受害者所寫的一系列回憶錄。在史達林時代，肅反運動清除了許多政治人物和文化知識份子，也使得無數女性不是喪失所愛就是被捕、監禁或流放。史達林去世後的解凍時期，許多女作家投入反抗式自傳的俄國傳統；她們的反抗傳統結合了對史達林獨裁統治的痛恨，以自己、家人或朋友所遭受的迫害記錄其苦難歷程。這些女作家，如葉芙戈尼雅·金斯伯格(Евгения С. Гинзбург, 1904-1977)，最初只是想把個人的作品當成驅除惡魔（史達林統治）和復興共黨理想的工具；然而，她們反而記錄了人權是如何地被侵犯的主題，而非促進一個理想的政治綱領。

史達林政府的任意定罪，使她們重新評價自身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歷史。當她們被非法審判，丟入監獄和集中營時，這些女作家遇到了許多其它不同類型的女罪犯，例如，非俄羅斯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或是女同性戀、雙性戀，來自不同階級的政治犯與普通罪犯等；不預期地，她們透過記錄其他被監禁女性生活的新角度與好奇心減輕了自己的痛苦。一般而言，這類自傳體的書寫與男性集中營的方式有極大的類似，大都缺乏自主性和團體歸屬感。無論如何，這些女作家敘述了其他女性的生活是某種有意義的舉動；不僅指出女性亦可將內在的價值分享給其他女性，更引導了某些社會價值的根本轉變，也就是更重視人權。這些女作家無形中促使「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社會遠離政治生活，用一種更深遠的理想取代對革

命偶像的崇拜、犧牲與奉獻－－也就是回歸人性。

第三種，文化保護者的女性自傳體小說多半來自受迫害者的妻子或女兒，她們被形容成「俄羅斯的文學寡婦」（Beth Holmgren, ed. By Toby W. Clyman & Diana Greene 1994: 136），主要和男性作家有關，明顯地承繼了文化保護者的責任和力量。史達林政權就像摧毀生命一般，摧毀了無數藝術創作者的文本。有多少男性受到壓抑，就有多少女性承擔保護未通過檢查制度、非官方文本的艱鉅工作。事實上，她們的傳記也就成爲戒嚴時期非官方俄羅斯文化的保護者和捍衛者。例如，象徵派詩人曼德斯坦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1-1938)的妻子娜潔虛妲・曼德斯坦姆（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9-1980）、作家布爾加科夫(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的第三任妻子依蓮娜・布爾加科娃（Елена Булгакова, 1893-1970）等，這些文學寡婦努力保護男性作家的檔案，在適當的時機出版他們的作品，並努力恢復他們的名譽。她們的回憶錄通常採取生活札記的形式，復原過去歷史的事實，去反駁那些傷害男作家的真實性形象；也因此，這些紀錄顯得更具可靠性。過程中，她們經常扮演支持伴侶的角色，有時是秘書，有時是紀錄者；依蓮娜・布爾加科娃就是在 1926 年布爾加科夫的日記被搜查沒收後，開始代替丈夫寫日記。

在許多案例中，文學寡婦技巧而堅持地完成保護者的責任，但卻常缺乏專業訓練。即使她們具有專業訓練並自覺有能力去寫作，她們的自傳也僅僅忠實地反應蘇聯歷史的創傷，並確保俄羅斯男權文化結構的繼續存在；莉吉亞・楚科夫斯卡婭（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 1907-1996）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是個文學批評家、編輯、小說作家，認真地維護一些作家的形象，其中包括自己的父親－－科爾涅・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9）。她在父親死後完成其作品《童年記憶》（Памяти детства, 1989），重點放在 1910 年代的童年時光，其中包括描述她與父親相處的歲月；在當時嚴格的審查制度下，幾次嘗試出版都終告失敗。這部作品雖聲稱是自己的童年往事，實際上是強調「父親是她的創造者」，她用不同的角度表現和贊同父親「創造者的形象」；父親楚科夫斯基是她終生價值的建立者。透過她的生活詮釋，她詳細地描述父親如何賦予她具有價值的詩學教育並針對文學職業做早期訓練。

然而，遺憾的是，楚科夫斯卡婭對父親詳盡的描述卻限制與混淆了她對自己的描寫。作爲旁觀者，我們可以瞭解她對父親的敬畏與被父親認可的渴望。她的敬畏和服從暗示著一種自我的隱藏；她似乎接受父權下普遍被接受的兩性階級模式，並在無意中去除了模式之外的女性自我。這種被歸類爲「我們」的普遍模式，包括女性特徵的主要內涵：玩洋娃娃，看女生的書，像小婦人一樣做女人的工作，烹飪、洗衣，不要引人注目，遵守女人本分地維持一個家庭。因此，她的童年自傳完全縮短了自己的少女時期，在強調她的創造者－－父親－－卓越的貢獻時，卻完全遺忘了自己的自傳。

第四種類型是自我追尋者。這類女作家企圖打破「父權制」，也就是突破以男性家長中心之制度爲典範而建構之人類傳統體系、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二十世紀初，以撰寫詩歌見長之女詩人瑪琳娜•茨維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的自傳式散文提供了追尋自我的女性作家極有價值的啓發。Svetlana Boym 認爲她的作品是「一個不順從的女性的獨角戲」，詩人希望保持女性身份，但卻將之推到極限，反而違反了文學的女性和男性氣質的常規。在散文作品〈我的普希金〉中，與其談到她的詩人前輩、導師、啓蒙者普希金，不如說更敘述了自我內在的深處：異教、黑暗、吉普賽人、反抗的布爾加喬夫（俄國農民）、大海、自由與詩歌。在大膽的探究自我女性身份的同時，茨維塔耶娃幾乎將自己和所有 20 世紀初的女詩人劃分開，成爲最勇於違反當時俄國社會規範的女作家。

瑪莉亞•阿爾巴托娃(Мария Арбатова, 1957--)代表了女性主義運動正式在俄羅斯發聲，她的自傳小說《我的名字叫做女人》(Меня зовут денщина, 1997)、《我四十歲》(Мне сорок лет, 1998)描述了女性身分在俄羅斯社會的困境與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坎坷路程。

本計畫研究目的：

1.「自我」與「他者」等理論建構；

2. 俄國革命前女性自傳體書寫歷史；

3. 二十世紀初俄羅斯女性革命者自傳體小說，以亞歷珊德拉・柯隆泰等爲例；

4. 二十世紀 30 年代女性政治犯自傳體回憶錄，以葉芙戈尼雅・金斯伯格爲例；

5. 二十世紀 30 年代文化保護者女作家自傳體作品，以莉吉亞·楚科夫斯卡婭等爲例；

6. 二十世紀自我追尋的女性作家自傳體作品，以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瑪莉亞・阿爾巴托娃爲例。

7. 結論

參、文獻探討

本計畫的主要參考文獻，俄語方面有：Колядич Т.М.,《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исателей》, 1998; Галич 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хужожественная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1984; Гаранин Л. 《Мемуарный жанр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6; Григорова Л.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зъм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1986; Коллонтай А. 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 1926; Гинзбург Е.《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 2007; Чуковская Л.《Памяти детства》, 1989；Арбатова М. 《Мне сорок лет》。

英語方面有：Helena Gocilo 的 Fruits of Her Plume，Dehexing Sex: Russian Womanhood During and After Glasnost，Sona Stephan Hoisington 所編的 A Plot of Her Own，Toby W. Clyman & Diana Greene 所編的 Women Writers in Russian Literature，Rosalind Marsh 所編的 Women in Russia and Ukraine，Women and Russian Culture，Serafima Roll 所編的 Contextualizing Transition: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s and Critics，Rosalind Marsh 所編的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Adele Marie Barker and Jehanne M Gheith 所編的 A History of Women’ s Writing 等圖書與研究論文。

肆、研究方法

新歷史主義研究途徑(New Historicism approach)、文化研究途徑(cultural approach)及社會心理研究途徑(socio-psychology approach)，透過文獻分析，對研究議題做深入歸納、分析、演繹及整合，冀以從男、女作家文學的深層意涵中推論出性別意識的社會意義、政治意義及文化意義，從而建構「他者」與「自我」等理論架構。

此外，將以俄國文學中自傳體書寫傳統類型爲基礎，探究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作家自傳體作品與回憶錄的寫作特色。

伍、研究結果

一、自傳體的主體問題

根據維基百科詞條，自傳是「一個人寫的關於自己的成長經歷傳記式文學體材。主要是以回憶為主，中間夾雜一些自己的想法，抒發某種情緒，自傳基本上是回憶錄的一種」。[2]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某人寫下對自己生活經歷的敘述”；事實上，自傳在自我敘事中對於主體身份的認知經常是捉摸不定的；普遍來看，自傳中的「我」，身份認知上是否就是「主人公／敘述者／作家」的三者合一呢？也因此，一般實在很困難給自傳下一個周全而嚴謹的定義。另外，就自傳體內涵的真實性來看，是否需要明確定義，亦值得商榷。1928 年法國傳記作家莫洛亞(André Maurois)就在《傳記面面觀》（*Aspects of Biography*）一書中提到，自傳基本上依賴人的記憶，而且描述的情景掌握在自傳者本人，然而，由於人的記憶誤差，以及人的主觀性和獨特的人格特質，敘述內涵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偏離真實性的方向。[3]

綜合各學派對自傳體研究的學術論點，大致可分爲四個面向：

1. 自傳即他傳

中國學者楊正潤先生在《傳記文學史綱》一書中將自傳界定爲「以作者本人為對象的傳記」。4具體來說，作者把當前的自我身份認知與自傳中的主人公角色分離，以「外位性」的立場描述或敘述過程事件的情節和情境。作者將自傳本身視爲表述的大舞台，在這個舞台上作者就能夠創造自由發揮的空間；他可以運用想像「忠實地」紀錄、描摹事件過程中的「我」，也可以假他自己的名字敘述別人的故事，甚至可以附加一些「想像」的故事。錢鐘書先生甚至直接否定自傳事件的真實性，認爲「自傳就是別傳」。大凡傳記當然都有其作者的影子，因而看來都像作者的部分自述，但是一般都有其主旨（main thesis）的隱喻或影射。另外的情況就是乾脆以「別傳」的形式呈現，「為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做自傳的人往往並無自己可傳，就這稱心如意地模擬出自己老婆、兒子都認不得的形象。或者東拉西扯地記載交遊，傳述別人的軼事。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不該看他為自己做的傳」。[5]這一段率性的說明，也就類似俄國文藝理論學家巴赫汀(М. Бахтин)的觀點：自己無法看清自己，只有從他者的「外位」觀照或反射才可以看到自己，因此，爲了完成自我的主體建構或

[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2%B3)
[3] André Maurois, *Sydney* Castle Roberts trans. *Aspect of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148-169.
[4] 楊正潤，《傳記文學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頁 30。
[5]錢鐘書，《寫在人生邊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頁 4。

認知，有必要從時間、空間及價值意識的生存座標中創造一個他者。[6]

在自傳情境中，敘述人是作者爲了使事件的進程能夠合理地邏輯發展，所設計出來的說書人；然而，自傳作者操縱著主人公和敘述人，所講述的故事也常常和寫作主體自身有不著邊際的情形。無論自傳是以第一人稱爲主角，敘述別人的故事，或講述與作者本人面目全非的「我」的故事，嚴格說來，它實質上都是別人的傳記。在自傳文本的自我描述過程中，無論是變形的自我，還是講述他人，自傳體的敘事雖然企圖建構一個與作者本人一致的主體，但是，最後呈現出來的圖像只能看到那個主體的一個側面，充其量只能說，類似作者的影子。

2. 主體是虛構的

表面來看，自傳體是對自我經歷的事件敘述，其敘述過程概都牽涉到對寫作主體的認識、理解與闡釋；然而，經過了一段時間和空間的轉移，人在過濾相關認識之後，其認知往往與客觀的事實內涵產生偏離，甚至有不準確的情形。關於這個現象，尼采也曾提出說明：「我們認識到的一切，都是東拼西湊的、簡化的、模式化的、解釋過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因果統一都是謊言…。認識論者設想的那種思維根本不會發生，因為，這全屬隨心所欲的虛構，其方法是突出過程中的某種因素而壓低其餘因素，以便進行明白無誤的人為加工…」。[7]

如此看來，自傳體的作家經過認知、體認後的行爲和行動，往往離當時事件發生的事實有一段距離，有時甚至是虛構的，實在難以歸爲任何文類。因此，自傳既不是寫實，也非完全虛構。客觀一點來說，自傳體其實只是一個漂移不定的敘述場域，在文本的事件敘述中交錯混雜著主體、自我和作者三種概念。

主體既然只是部分，那麼主體究竟又是什麼呢？17 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 (Rene Descartes) 認爲：主體與身體應該有著明確的界線。理論上，我認識到的「我」是一個本體，它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只是思想。本質之所以是本質，「祂」並不需要因地點而存在，也不需要依賴任何物質性的東西。所以，這個「我」，就是使我成其爲我的靈魂，是與形體完全不同的。[8]換句話說，笛卡爾的主體是思想，是「我思」，不是人的軀體；他企圖建立的是精神性的主體哲學觀，有別於一般所認知的物質性主體，但也激起很大的爭議。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

[6]M. M. Bakhtin 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7]尼采著，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利意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 274-275。
[8]笛卡爾，王太慶譯，《談談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28。

法國精神分析家拉康 (Jacques Lacan) 就極其排斥“我思”形式的主體，並提出另一種“無意識主體”或“言說主體”的概念。

拉康認爲：主體（兒童）所認知的世界是以母親在生活境域中的各種行爲和活動作爲認識主軸而開始的，母親的在與不在，一方面給兒童帶來挫折，另一方面也爲兒童打開了象徵的維度。顯然，這種象徵秩序是先於人類主體存在的秩序。每一個嬰兒在出生之前，父母或其他的人都已建立了既有的言說方式，因此，對於嬰兒的主體而言，除了認同這種秩序，模仿相關的表達方式及邏輯之外，別無其它選擇。然而，這種象徵秩序並非先驗存在或先天性的東西，它並不能自然地繼承給每一個剛來到世上的主體；對於秩序的認知和參與，主體需要通過學習才能進入。因此，對於主體而言，象徵秩序是構成性的。[9]當一個人說「我如何如何…」時，“我”只是陳述句子中的“我”，指示 (designe) 了事件中所說出的主體，但並不表示或指稱(signifie)說出了本質或精神的主體。[10]簡言之，在人稱代名詞“我”的後面還有一種作爲說出（說話）主體的“我”。若說人稱代名詞的“我”代表意識主體的話，那麼，說出（說話）主體的“我”就是一種無意識主體，是隱匿的。因此，自傳中的“我”只是陳述句子中的“我”，是一種符號化的說話主體，而非真正本質性的主體。而對於說話主體而言，他者是不可或缺的，他者是“能指”的寶庫，是說話主體的參照，要是缺了它，「能指」就無法組織起來，主體也就無法正常說話了。也就是說，主體的形體指涉必須透過與他者的相對關係，才能明白確立。依此觀點，笛卡爾的「我思主體」，就會走入「主體」概念不清，無法「指涉」的窘境；主體會變成是虛構的，如此一來，「我」的經驗性敘述便是經過「我」的意識過濾的虛構，這樣就會陷入沒有真實性的死角中。總結而言，自傳體的主體將藉由事件過程對「我」的指涉游走於虛構的「我」與背後真實的「我」之間；因而，下列就從動態的、多面的自我角度途徑來探討。

3. 自我是動態的、多面的（從自我角度審視）

由於自傳體的「主體」認知具有模糊性，所以從主體的角度剖析自傳，就很難確定自我敘述的真實主體身份。那麼就有必要從自傳文本生產的另一面向－－「自我」的角度出發－

[9] Lacan, *Ecrits,* 1966p, 12.
[10] Ibid. p.800.

－對自傳作另一番觀察。心理學家贊登（James Zanden）從認識論的角度定義自我：自我是世人對自己的認識，然後再反照於自己的認知。贊登指出，這種認識是「我們身體的核心所在」、「在此核心四周聚集著我們的喜怒哀樂」。11

廿世紀 60-70 年代，盛行著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爲：語言是建構在自我身份形成的過程，因此，語言才具有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法國語言學家奔文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將「自我」定義爲『「言說」自我的那個人』，[12]因爲，主體的根本認知是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與環境的相對關係而建立起來的。另外，克比（A. P. Kerby.）也認爲在敘事層面上，自我是「語言的一種產品」。[13]

以上是從自我的外在面向去探討自傳體的「主體」建構，接下來，如果從內在的面向來探討，那麼就必須從神經生物學的途徑去理解。從生物的生存機能來看，人腦的神經組織爲了適應外部環境不斷變化的需求，整個組織會持續的做自我修正、進而產生不斷的進化。根據神經生物學，人對外在世界的認識一般會受其經歷的影響；認識的過程時常會因爲受到生理的影響而改變人的心理認知。人的神經系統不斷地進行改編、剪裁、進化，最終形成人們稱之爲個性、人格特質或靈魂的東西，如經驗、意志、責任感、道德感等等刻烙在人的神經系統中。結果，每個人的大腦結構與思維就因經歷的差異而形成其自我的獨特性，完全不同於其他任何人的頭腦。[14]意識對完整事件的接受（register），既不是「再現」式的，也不是「刻錄」式的；它是動態的，處於進化狀態。史蒂溫(Levy Steven)認爲，「大腦是在建構事物（…）它並不是如鏡子般地反應事物（…）甚至在掌握語言之前，大腦也在一點一滴地建構你所認識的世界」。[15]由此可知，每一個認識都是一次創造行爲，整體的認知是一種動態交互作用的結果。

從自傳和傳記的角度來說，Life（生命、生平、生活）中應該不僅僅包括「我思」這個笛卡爾式的主體，也包括導致「我思」的身體機能，即實現認識的神經系統。而人的神經生理系統既影響人的認識智能，也影響人的記憶功能。羅森斐爾德(Israel Rosenfield)指出，記憶本身是一種當下正在發生的感知活動，而不是已經被儲存下來的、過去的固定影像，被神秘地

11 James Zande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87, 142.
12 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224.
13 A. P. Kerby, *Narrative and the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
14 Oliver Sacks, 'Neurology and the Soul',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37, no. 18 (Nov. 22, 1990) p. 44-50.
15 Levy Steven, 'Dr. Edelman's Brain', *The New Yorker(* 2), May, 1994.

召回到現實的意識中來；他說：「回憶是一種感知活動，…每一種語境都會改變回憶內容的本質」。[16]也許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溫故而知新」。因此，記憶是自我參照的，每一次回憶都不僅涉及記憶中的人、事、物，也涉及正在進行回憶的本人，包括他本身的參與和認知情境。由此看來，自我可以說是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每一種境遇都代表了自我的一個側面，因此，「自我」就從單數變成了複數，也就是代表了多元面向的內涵。

針對多元性的觀察，美國心理學家奈瑟(Ulric Neisser)將人的自我概念分爲五個階段：[17] (1)生態的自我，物理環境中的自我。「我」就是此時此刻此地的一個人，做著我自己的事（嬰兒期）；(2)人際認知的自我，即與他人直接進行，但沒有回顧性活動的交往，處於純認知狀態的自我（嬰兒期）；(3)引伸的自我，即有了經驗認知後，記憶中與預測中的自我。這個自我存在於現時之外，我是個有過往經歷的人，定期參加一些專門的熟悉活動（三歲後）；(4)私自性的自我：即他人不能獲得的那個意識的自我，在生理及心理層面上，我視自己爲獨特感受－－感官與感情的覺知－－的自我；(5)觀念性的自我（conceptual self），即自我觀察與訊息認知的極端多樣性形式。——如社會角色、個人特質、身體與意志的各種主張，主體與環境訊息及他者觀念的關係感受等。這些形式或清晰或含糊地將自我歸爲一個類別。前二者是自我的初級階段，後三方面是自我形成的高級階段。而最後階段的發展則有賴於個人直接所接觸的家庭文化和社會文化的薰陶。這種自我的形成路徑成了傳統自傳體作者們運用的通則手法。自傳體作者們總是通過發覺「觀念性自我」的文化積累來講述多元性自我和私人自我的故事。

4. 巴赫汀對話理論中的主體建構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自我泉源》（*Source of the Self*）一書中，涉及何謂自我這一問題時，也是從語言切入。大部分學者強調視覺記憶，即記憶所見物。泰勒則引入語言這一要素，而提出了「對話網」[18]（Web of interlocution）的概念。我們只有在這種「會話網」，或者說廣義的「交際」（conversation）之中才能成爲自我。廣義來說，現代西方的自我的生成是因爲一系列顯像存在的和隱含存在的對話者（不僅包括父母、老師、同事，也包括去世已久的作家、神話英雄）將自我引入到各種不同的、互相衝突的「分辨道德

[16] Israel Rosenfield, *The Invention of Memory: New View of the Brain,* New York Basic, 1988, p. 89.
[17] Neisser Ulric, 'Fine Kinds of Selfknowledg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988, pp. 35-59.
[18] Charles Taylor, *Source of the Self,* P.36.

與精神是非的語言」之中，這諸般聲音漫無目的而又潛移默化地對自我發生著影響。[19]這段話與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相似。

巴赫汀並沒有明顯的區分主體與自我，他是以整體看待自我的主體建構。在他看來，「主體不是一個上帝賦予的、先驗的、形而上的存在或實體，而是一個不斷建構自身的過程。這個能動的、發展的、建構的過程，主要是在相互運動、交流、溝通中的關係上呈現出來」。[20]人的存在，包括理性、感性與其它部分從來不可能孤立或脫離與他者或社會群體的相互關係，在人的相互交往、相互溝通中，首先要確立「自我」與「他者」的基本範疇，人就是在與他者之間的相互對話、相互理解中建構個人的主體和自我，從而建立社會整體。

每個人的個體在現實世界中都有其不可取代，獨特的感性體驗，這種體驗被巴赫汀稱爲「視域剩餘」，也就是說我們自己看不清自己（例如，背後、臉頰），我們看到的只是片面的自己；但是，我們卻看得到「他者」，這就是每個人擁有的「視域剩餘」。因此，我們的視角可以互補，保證了主體的「外位性」[21](вненаходимость)，並使人與人之間的價值交換成爲必要。主體的「外位性」的高度集中、凝聚，形成一種審美的「超在（越）性」。『在「超在性」的認識視野和觀照中，人類主體才能希冀達到完美的界界』。[22]

巴赫汀在＜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角＞(Автор и герой в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一文中指出：「作者必須把自己置身於自我之外。作者必須從自己現實體驗生活的不同角度來體驗自我。只有滿足了這個條件，他才能完成自己，才能構成一個整體，提供超在（越）於自我的內在生活價值，從而使生活完美。對於他的自我，他必須成為一個他者，必須通過他者的眼睛來觀察自己」。[23]然而，將自己置身於自我之外的過程並非易事，特別是在作者就是自傳體的主角時。「自我」往往難以徹底超越於自身的另一半－－「他者」，反之亦然。

二、俄國革命前女性自傳體書寫歷史

[19] Ibid. p.292.
[20]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1998(2)，p. 84。
[21] 「外位性」是指主體的自我對於他者在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上的外在位置。
[22] 同註 16, p.85。
[23] М.М. Бахтин.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Literat/Baht_AvtGer/index.php (2011.04.26)

自傳在過去與現在的自我對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父權體制下，通常從過去女作家第一人稱的紀錄中，我們可瞭解女性過去的生活軌跡。俄國女作家的自傳與回憶錄與小說文體總是扮演著密切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自傳或回憶錄經常以小說的形式表現。

女作家自 19 世紀前葉就開始出版想像的敘述性散文，1830 年之後小說成爲主要的文類。俄國女作家自傳書寫可追溯到 18 世紀後半葉，是至是凱薩琳二世或女貴族葉卡潔琳娜・達盧柯娃(Екатерина Романовна Дашкова, 1743(1744)-1810)等公眾人物的自傳在當時也是以手稿流傳，在死後數十年後才得以出版。

俄國革命前女性自傳書寫的數量很多，至少有 200 部以上回顧性的生活書寫，其中包括：對「偉大男人」的回憶、家庭記事與旅行紀錄。這些作品至今一一出版。在這些文學歷史文本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它記錄了當代的文化及作者寫作的模式；第二，作品融入文化洪流，無論公開或隱匿都可能影響到文藝作品類型的發展。

從出版日期來看，1860 年以前的俄國女性回的自傳書寫不超過 20 部，1860 年代亦約 20 部。1870 年以後，由於歷史性雜誌與社會性小說雜誌的發行增加，自傳與回憶錄的作品持續不斷出現。蘇聯時期，包括自傳等作品受到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環境的影響，而遭受嚴厲的壓制。除了對傑出男性的歌功頌德的作品外，一般革命前俄國女作家自我表達的豐富遺產遭到漠視。在這種背景下，仍有少數參與革命運動的女作家自傳作品通過檢查出版。在流亡女作家的作品中，多數女作家描述了她們革命前的年輕年代，然而，許多作品並未出版，難以估計在俄羅斯與國外這些遺失的珍貴資料的數量。

俄國革命前的女作家自傳書寫大致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經歷了整個十九世紀前期，僅少數的女作家採用西歐的模式，是以最傳統的，以自己爲主角的自述方式書寫。到了十九世紀中的第二個時期，受到俄式維多利亞規範(Russo-Victorian norms)的影響，女作家改變文類，敘述者以旁觀者或編年史家的身份記錄他者的生活。在第三個時期裡，女作家受到現代主義描寫個人心理風潮的刺激，才開始以自我爲中心的方式展開敘述。其中最具特色的八位作家。娜潔盧達・杜若娃(Надежда Дурова, 1783-1866)與娜潔盧達・索漢斯卡雅(Надежда Соханская,

1823-1884)的作品屬於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創作；阿芙多琪雅・帕娜耶娃(Авдотья Панаева, 1820-1893)、瑪麗亞・卡緬斯卡雅(Мария Каменская, 1854-1925)、葉卡琪琳娜・尤恩格(Екатерина Юнге, 1843-1913)等女作家的作品創作於十九世紀末，出版於二十世紀初；安娜斯塔西亞・維爾碧芝卡雅(Анастасия Вербицкая, 1861-1928)、瓦蓮京娜・德密特里耶娃(Валентина Дмитриева, 1860-1947)、安娜史塔西亞・茨維塔耶娃(Анастасия Цветаева, 1894-1993，女詩人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妹妹)創作與出版於二十世紀。

杜洛娃（Надежда Дурова, 1783-1866）

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女騎兵，同時也是作家，她以男裝扮相出入戰場，自稱「亞歷山大・杜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Дуров），大陸學者稱她爲「俄羅斯花木蘭」。[24]1812 至 1813 年以「手記」（Записки）寫作記錄俄法戰爭與軍旅生活。1836 年，杜洛娃由於經濟窘迫遂寫信給詩人普希金，請求他在文學雜誌《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中刊載她的手記內容，以掙稿費。手記文章以標題《少女騎兵》（Кавалерист-девица）出版後，受到茹可夫斯基與果戈理的讚揚，評論家別林斯基則盛讚普希金與杜洛娃的合作：「多麼好的語言詞藻，多麼好的音韻。彷彿普希金親手贈她生花妙筆，賦予她英勇的果斷力量、耀眼的書寫技巧，她的小說給人如賞畫般愉悅感受，字裡行間蘊含真知灼見」。[25]出版內容以 1812 年戰爭爲主要背景，也有評論者將她的戰場描寫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

1840 年，杜洛娃的手記作品集結四冊出版，創作主題包含女性解放與消弭兩性社會地位的歧異。

---

24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1955138-1-1.html。

25 **原文**：И что за язык, что за слог у Девицы-кавалериста! Кажется, сам Пушкин отдал ей свое прозаическое перо, и ему-то обязана она этою мужественною твердостию и силою, этою яркою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стию своего слога, этой живописною у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ию своего рассказа, всегда полного, проникнутого какою-то скрытою мыслию. （**來源**：http://fershal.narod.ru/Memories/Texts/Durova/Smirensky.htm）。

索漢絲卡雅（Надежда Соханская, 1823-1884）

身分爲作家、評論家與劇作家，以筆名「戈哈諾夫絲卡雅」（Кохановская）與「馬卡洛夫絲卡雅」（Макаровская）進行創作。索杭絲卡雅個性獨立，不隸屬於任何黨派，她與政治立場不同的文學雜誌皆有合作，其中《當代人》雜誌編輯、浪漫主義作家布列特紐夫（П.А. Плетнёв, 1791-1866）對她的影響甚爲深遠。

1844 年，索漢絲卡雅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司馬金少校》（*Майор Смагин*），但是迴響不大。1846 年，她向布列特紐夫毛遂自薦，將自己另一部作品《女伯爵 D》（*Графиня Д*）寄給他。布列特紐夫不滿意這部作品，直言這部作品很弱，但是他仍在女作家的筆鋒之間看到她的才華，他遂請求索漢絲卡雅以自己的生活環境爲題材進行創作。索漢絲卡雅在回信中表示：「我將一五一十揭露自己的內在生活與心情感受，這是我對您的保證，以表示我對您的忠誠以及無上的敬意」。[26]1847-48 年期間，索漢絲卡雅將生活書寫分成五個部分，分別寄給布列特紐夫。

這部作品成爲索漢絲卡雅的自傳，她在裡頭描寫自己的艱苦童年生活，儘管家中沒有糖果玩具，但是有滿滿的愛，自傳中的人物以女性爲主（母親與姨媽）。此外她也喜愛閱讀，自學古斯拉夫文、文學理論等。此外，自然環境描寫也是她的創作題材，她將自己的個性比喻爲「荒原」（степь），作家謝德林（М.Е.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也盛讚她的自然描寫才華：「她清晰地重塑了生活樣貌，讓讀者感覺到難以感知到的光與影」。[27]

自傳中也寫到就學生活，在學校裡也是充滿女性，只是不同於童年時代的溫柔姨媽們，學校裡的女性是嚴格的監督員與教師，她們教導學生過往陳腐的教條。索漢絲卡雅描寫學校生活的艱苦，受到侮辱，那是一段漫長、艱苦、充滿淚水的日子。索漢絲卡雅對於布列特紐夫完全信任，她將自己的心聲全然揭示：「您認爲我是否真誠？我所說的這些，女兒不見得會

[26] 原文：Я разверну пред вами внутреннюю мою жизнь, ощущения духа, – это будет залогом моей к вам неизменной преданности и того глубокого ув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ми я полна к вам.

[27] 原文：(писательница)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т эту жизнь осязательно и даёт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читателю почти неуловимые её света и тени.

告訴父親。我揭示所有的內心變化，只求能向最尊敬、明理、崇高的朋友坦承心聲。我向您坦承一切，彼得・亞歷山大洛維奇」。[28]

書中有很大的篇幅在述說作家對於愛情與家庭的態度。她不喜愛男性將女性當成商品來「選擇」，她認爲婚姻要有愛情的基底，不贊同爲了嫁人而嫁人。因此，她對於「老處女」（старая дева）的說法也不以爲意。

在當時曾有作家維洛夫金（Н.Верёвкин）寫書嘲笑女性作家，他認爲女性的作品有害健康、無恥且空洞。但是索漢絲卡雅無懼於這些指責，繼續從事創作，然而她的論點與行爲有矛盾之處：她也認爲女人不該寫作，因爲女人的內心世界是很神聖，只能向家人顯露，但是「一群灰貓裡偶爾還是會出現三色貓，有如女人裡的女作家。這是我的命運，就像是被移植異地的花朵」。[29]可以說索漢絲卡雅對於女性仍有刻板印象，禁止女性從事創作，但是她卻將自己視爲這項法則之下的特例。

乍看這部自傳，會讓人以爲作家仍不脫傳統觀念對於女性的桎梏。但是進一步檢視索漢絲卡雅的創作態度，我們可以發現她勇於對抗家庭專制以及「治家格言」（домострой）傳統。之後索漢絲卡雅繼續創作許多作品，如《愛過》（Любила, 1858）、《午飯後作客》（После обеда в гостях, 1858）、《普希金墳上的荒野小花》（Степной цветок на могилу Пушкина, 1859）、《基里拉・彼得洛夫與娜絲塔西亞・德米特洛娃》（Кирилла Петров и Настасья Дмитрова, 1862）等。她的作品受到熱烈迴響，有人讚她：「果戈理以來，再也沒有見過如此耀眼的想像力與深刻的感情」。[30]

---

[28] **原文**：Судите, довольно ли я искренна. Так говорить – не говорит даже дочь с отцом; этак, развёртывая все изгибы души,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исповедываться глубокоуважаемому, разумному, благородному другу; я исповедалась вам, 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29] **原文**：«.женщина не должна писать! Не должн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им нарушается её первое чувство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скромность. Пиша,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слишком наоткрыто со всем своим задушевным миром чувств и мыслей, со всею силой своего сердца; а эт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Мир сердца,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женщины – священен; он должен быть известен только своей семье и никому более! Не всякому праздному безделью, которое, в полутумане вина и трубки, захочет заглянуть в него. Женщина может и должна писать одни детские книги». «Между серыми кошк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же иногда трёхшерстные: вот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между женщинами. – Это моя доля, как доля пересадного цветка расти на чужбине»

[30] **原文**：Никог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со времени нашего бессмертного Гоголя, не видали мы такой светлой фантазии, такого глубокого чувства, та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ины в вымысле, как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одписанных именем г-жи Кохановской.

帕娜耶娃（Авдотья Панаева, 1820-1893）

阿芙朵奇亞・帕娜耶娃於 1839 年下嫁帕納耶夫（ И. И. Панаев），但是婚後生活並不愉快。1846 年納帕耶夫與詩人涅克拉索夫聯手恢復文學雜誌《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的營運，也拉近了阿芙朵奇亞・帕娜耶娃與涅克拉索夫的關係，進而維持長達近十五年的「同居」關係（гражданский брак）。帕娜耶娃的首部中篇小說《塔尼科夫家族》（Семейство Тальниковых, 1847）擁有自傳色彩，她描寫自身醜陋、野蠻的童年。作品出版恰逢法國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認爲這部小說擁有煽動革命的因子，因此禁絕出版。這部小說受別林斯基與涅克拉索夫的讚揚。作家楚科夫斯基（К. Чуковский）[31]認爲小說主題與涅克拉索夫的創作主題相近：揭露童年的不愉快回憶以及對於父親的指責，[32]當時詩人常在詩作中批判自己的父親。楚科夫斯基甚至懷疑在帕娜耶娃寫作過程中，涅克拉索夫也從中參與創作，小說每一頁都能感受出涅克拉索夫的筆觸。

1847 年至 1862 年，帕娜耶娃積極投入由涅克拉索夫主編的《當代人》雜誌編輯。期間她與涅克拉索夫合著小說《世界三國》（Три страны света, 1849）與《死亡之湖》（Мертвое озеро, 1851）。受到自然主義的影響，帕娜耶娃在創作中也開始探討社會生活、女性地位、愛情、婚姻與教育等議題。早期的小說多描寫女性無法與社會環境對抗而成爲了受害者（《冒失話語》（Неосторожное слово, 1848）、《醜丈夫》（Безобразный муж, 1848）、《養蜂場》（Пасека, 1849）、《草率的決定》（Необдуманный шаг, 1850））。在長篇小說《生活瑣事》（Мелочи жизн, 1854）中，女主人翁開始起身爲權益與陳腐的偏見奮戰。然而受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影響，帕娜耶娃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女人的命運》（Женская доля, 1862）。小說中反應了作家自身寫照：失敗的婚姻與同居生活的道德考驗，此外小說劇情也形塑出「新人類」（новые люди）形象：女性在社會與家庭中跳脫「治家格言」（домострой）的框架，多了自由、理智且彼此尊敬。[33]

---

[31] **資料來源**：http://www.chukfamily.ru/Kornei/Prosa/talnikov.htm。

[32] **涅克拉索夫出生於地主家庭，父親粗暴無知，詩人是在母親的保護教育之下完成中小學教育。（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台北：書林，2007: 193）**

[33] **原文**：Одно из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анаевой – роман Женская доля (1862), в сюжете которого отразились этапы

帕納耶夫過世、與涅克拉索夫分手之後，帕娜耶娃改嫁，生下一名女兒。晚期她感覺自己是遭過往文學時代所遺忘的作家，1890 年出版回憶錄《俄國作家與演員 1824-1870》（*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артисты. 1824–1870,* 1890），書中豐富記錄 1840 到 60 年代的俄羅斯文學圈生活，其中包括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巴庫寧、朵布羅留博夫等。

卡緬絲卡雅（Мария Каменская, 1854-1925）

女中音（меццо-сопрано）聲樂家，她擁有寬廣的音域與純正的發音腔調，1891 年開始爲馬林斯基劇院的獨唱家，後來被封爲「獨唱家陛下」（Солистка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34]

尤恩格 （Екатерина Юнге, 1843-1913）

俄羅斯風景畫家，爲雕刻家費德爾・托爾斯泰（Фёдор Петрович Толстой, 1783-1873）的女兒，作家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的堂妹。她在回憶錄中記載托爾斯泰年輕時曾往來於她們家。 1903 年，托爾斯泰請求尤恩格幫忙收集著作《哈吉穆拉特》（Хаджи Мурат）需要的相關文獻資料，因此尤恩格在那段時間曾往返於「晴園」。[35]

提及「女性藝術」（жен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時可以看到她的名字，但不是文章論述重點，[36]只是隨筆帶過。[37]

жизни самой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неудачное замужество,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спытан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брака) и, в духе идей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овых людей», лишенных домостроевск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 месте женщины в обществе и семье, свободных, разумных и уважающих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друг друга.

[34] **演出曲目請參見**：http://slovari.yandex.ru/~~книги/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20певцы/Каменская%20Мария%20Даниловна/。

[35] **來源**： http://feb-web.ru/feb/litnas/texts/l37/t3726462.htm。

[36] 請見：http://www.dissercat.com/content/tvorchestvo-zhenshchin-khudozhnits-v-kulture-rossii-na-materiale-svetskogo-iskusstva-xviii-p

[37] **文章只有提到**：В 1854 году, большой золотой медали ИАХ за пейзаж с натуры, удостоилас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ица старинного дворянского рода, сестра знаменитого драматурга Софья Васильевна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а (1825-1867).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придавали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ому, что в лице Софьи Васильевны впервые в России явилась

維爾畢芝卡雅（Анастасия Вербицкая, 1861-1928）

出身貴族家庭，曾就讀女子學校（Елизаветинский же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與莫斯科音樂學院（Москов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1882年下嫁貧窮工程師維爾畢茲基(A.B. Вербицкий)。寫作生涯始於1883年，她先後在俄羅斯各大報刊發表文章，首部中篇小說《紛爭》(*Разлад*, 1887）以「女性解放」(женская эмансипация）爲題材獲得迴響。「家庭紛爭」(семейный разлад）貫穿作家的創作母題：維爾畢芝卡雅被喻爲「勤勉的女權主義者」（ревностная феминистка），她主張女性擁有自主權，不該依附於男性，應該靠自己的能力生活。除了寫作，維爾畢芝卡雅也協助女性翻譯者出版關於女性解放主題的書籍，她認爲文學是反動及宣傳利器（орудие борьбы и пропаганды），渴望藉此改變女性的社會地位。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維爾畢芝卡雅發表了一系列作品：《瓦瓦卡》(*Вавочка*, 1898）、短篇小說集《生活之夢》（*Сны жизни*, 1899-1902）、[38]《解放》（*Освободилась*, 1902）、《瑪莉亞·伊凡諾夫娜之罪》(*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Марьи Ивановны*, 1902)、《一則生活故事》(*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жизни*, 1903）、《幸福》（*Счастье*, 1905）、《幸福之鑰》（*Ключи счастья*, 1909）等等。其中《幸福之鑰》以灰姑娘故事（Золушка）爲原型創作，講述女人性解放，1913年該小說被翻拍爲電影發行。除了小說，維爾畢芝卡雅也從事劇本創作：《誰之過》（*Чья вина*, 1904）、《海市蜃樓》（*Миражи*）等。

維爾畢芝卡雅在二十世紀初期得到極爲響亮的名聲，她參與關於女性權益的晚會、也投身文學活動，與作家布寧結識，同時也受到高爾基的注意：高爾基指出《瓦瓦卡》揭露世界的庸俗市儈之氣，他高度評價維爾畢芝卡雅的作品，認爲她的作品富有生命價值。

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維爾畢芝卡雅的寫作風格轉向，她開始以各式筆名創作兒童文學，她的作品被歸納爲「庸俗文學」(бульва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引發文學界爭議。

1928年逝世於莫斯科。

женщина, отличившаяся на поприще изящных искусств. Об этом событии вспоминала в своих мемуарах художница Екатерина Федоровна Юнге (урожденная Толстая). [173, с.57]

[38] **收錄文章請參閱**：http://ru.wikisource.org/wiki/Сны_жизни_(Вербицкая)

德密特里耶娃（Валентина Дмитриева, 1860-1947）

民意黨人（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自 1870 年代開始參加革命運動。曾擔任鄉村教師與醫生。最重要作品爲《在農村。醫生手記》（*По деревням. Из заметок врача*, 1896）、《自願者》（*Доброволец*, 1889）與《自傳》（*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1901）。她也寫一些關於鄉野風俗的中短篇小說與童書，其中最有名的是《小男孩與看門狗》（*Малыш и Жучка*, 1896）

安娜史塔西亞・茨維塔耶娃（Анастасия Цветаева, 1894-1993）

1915 年出版第一本書《王者思維》（*Королевски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1915），1916 年發行第二本作品《煙，煙，煙》（*Дым*, *дым*, *дым*, 1916），以日記手札方式完成。早期這兩本書的風格色調相近，但前者是關照「孤寂的智慧」（книга одинокого ума），而後者爲「孤寂的心」（книга одинокого сердца）。受到杜斯陀耶夫斯基的影響，她企圖解放人類遭禁錮的心，傾聽內在心聲：「我愛自己的內心聲音勝過愛其他人。我愛永恆、黑暗、寂靜、時間輕聲地流動。而我最愛的是自己.....」。[39]從二〇年代初期開始，安娜史塔西亞終其一生奉行東正教苦行僧「禁慾主義」（аскетизм），1927 年她收集人們對於不久前饑荒的看法，出版了《飢餓的歷史》（*Голодная эпопея*, 1927），她在序言中寫道：「當麵包戰勝糧荒，我們仍可回憶起人們口中的那些苦日

[39] 原文：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люблю человека больше своей души. Я люблю: вечность, тьму, тишину, тихое движение времени – и среди всего этого – себя…（來源：http://aidinian.org.ru/anastasiya-cvetaeva/kniga-odinokogo-serdca#_edn1）。

子」。[40]然而這部作品與下一部《SOS，或天蠍星》（SOS, *или Созвездие Скорпиона*, 1927）皆遭政府禁絕發行。之後安娜史塔西亞前往歐洲，她在巴黎與姊姊瑪琳娜見面，這也是她們最後一次見面。[41]

她持續在創作中注入自己的宗教哲學觀點，也因此遭到政府的關注，多次遭逮捕：1933 年第一次被捕，後來因爲高爾基的援助而出獄。1937 年被以反動罪名判處十年勞改， 遭流放至西伯利亞及遠東集中營，作品也遭到沒收、銷毀，1941 年她於遠東地區接收到姐姐的死訊。虔誠的信仰支持她面對這些浩劫：「面對拷問時必須堅強地撐著，人的堅毅可以瓦解他們的暴力」。[42]1947 年她重獲自由，但是 1949 年再一次被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亞，直到 1959 年才獲得自由。在遠東集中營期間，安娜史塔西亞利用煙卷紙從事小說《愛》（Amor, 1991）的創作：她將煙卷紙捲成管狀藏在毛氈靴裡，有時候這些紙張會拿來捲煙而抽掉，因此六〇年代重獲自由後，她遂重新書寫遺漏的部份，一直到 1991 年這部小說才正式問世。她亦重新創作遭蘇聯官方銷毀的作品，並以長達近二十年的流放經驗爲靈感書寫小說：1988 年出版《我的西伯利亞》（ *Моя Сибирь*, 1988）與《老與少》（*Старость и молодость*, 1988）。此外，她也撰寫回憶錄《回憶》（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981），主題包含童年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內戰與關於姊姊瑪麗娜的故事。這本回憶錄將安娜史塔西亞帶回文學界，這本書記錄了俄國的文學史。安娜史塔西亞晚年致力於在莫斯科開幕瑪琳娜・茨維塔耶娃博物館。

三、 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背景

自廿世紀七〇年代以來，女性主義學者致力於重新詮釋女性作家作品。在揭發父權文化特權及挑戰男性傳統規範時，發現最有成果的就是女性自傳體詩學。女性自傳作品不僅透露了

---

[40] 原文：Сегодня, когда хлеб победил бесхлебье, мы можем вспомнить, что народ говорил в годы трудностей.（來源：http://www.krugosvet.ru/enc/kultura_i_obrazovanie/literatura/ TSVETAEVA_ANASTASIYA_ IVANOVNA.html）。

[41] 她曾在 1916 年說道姊姊的死亡將會成為她生命中最深沈的苦痛：Маринина смерть будет самым глубоким, жгучим – слов нет – горем моей жизни.（來源同上註）

[42] 原文：На допросах надо держать себя крепко, и тогда их усилия разбиваются о крепость человек.（來源：http://www.za-za.net/index.php?menu=authors&&country=rus&&author=melnikova_tatjana&&werk=001）

男性傳統對女性題材的忽視與排斥，同時重新描述了女性與「他者」有關（而非分離）的自我；它奮力從父權定義的模式中解放出來，並且以零散的、沒有中心的、不用押韻的、隨興的語言形式，深刻描述了女性的生活故事（Domna Stanton 1984:3-20）。當然，該時期的女性自傳作品仍然集中在西歐和北美，大致是屬於第一世界的文化和受到第一世界殖民或壓迫的對立者，以及他們之間相互影響的範圍。至於俄羅斯、蘇聯和東歐的作品則不屬於女權主義學術研究的主流，一般被放在殖民者／被殖民者的關係之外。這些文本究竟應定位在哪個領域？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探討。

如同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揚棄歐洲文學的規範，這些女作家似乎也抗拒將自己的作品納入西歐的作品之中，強調俄羅斯文學的獨特性和優勢。若要深入瞭解俄羅斯女性自傳體作品，除了分析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創作之外，還需要特別探究蘇聯時期女性自傳體作品所反應的獨特模式。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自己合併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不僅征服非俄羅斯民族，並且疏離了被剝奪基本人權的俄羅斯社會。俄羅斯女性的自傳書寫方式經常揭發或反對鎮壓者的不公，並以道德行爲表達對其他受迫害者的關心，使崇高的文化與價值繼續保存；或是反抗男權爲中心的話語表述，追尋女性自我的艱難歷程。歸納起來，這類女作家，大致可分爲四種類型：革命者、政治犯、文化保護者與自我追尋者。

革命類型女作家的產生，主要是源自十九世紀末與廿世紀之交的社會背景；她們在推廣女性教育和爭取女性工作機會數十年後，將自己冒險經驗的故事發表在報章雜誌上，一方面作爲她們新角色（醫生、律師、工程師、老師和革命者）的證明，同時也作爲鼓勵其他女性進入公眾領域的見證。顯然地，在所有的女性職業自傳中，最有影響力應該就是女性革命者的傳記；她們的生活故事不僅可看作服從當時革命黨的重要歷史文獻，更可擴大爲悠久的俄國反抗式（反對沙皇統治）自傳體傳統。她們這種特殊爲服務革命的文本，確實在當時扮演了啓發性意義：以堅定自我犧牲的紀錄，爲當時社會建立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模式。她們將自傳當成世俗聖徒的生活紀錄，追求真理朝聖者的證明書。她們通常將自己刻劃成品格高尚、利他主義、完全獻身革命的女革命者。然而，當她們將自傳當成「反向書寫」的幻想時，「公眾我」和「清晰的使命感」容易將她們的生活故事簡單化和系統化（Babara Helt 1987:68-69），

但在無形中卻遺忘了「女性我」。

這些女傳記作家通常將自己步入地下政治的抉擇歸因於追求女性解放。例如：薇拉・拉蘇莉琪（Вера И. Засулич, 1849-1919）認爲革命的幽靈把她從成爲家庭教師的命運中解放出來，讓她可以和男性平等。當她們在描述個人故事時，往往不能坦白的表現自我，容易根據一般忠誠男性革命家的模式去編造自我的形象。在自傳中，背負著階級鬥爭意識與對人民的關心，她們不得不忽略自我的性別經驗，或是用高尚的奉獻取代個人生活的敘述，也因此，傳統家庭角色往往被拋棄或次於革命工作。這種沉默的附屬關係被痛苦地寫在女權活動家亞歷珊德拉・柯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的自傳裡。比起任何其他的女革命家，她的例子是既典型又諷刺的。她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激進份子，曾短暫地成爲新蘇聯社會最傑出的女性革命家。在她的文章和小說中，柯隆泰企圖將政治革命與個人性解放連結在一起，夢想在蘇聯社會建立一個性誠實、享樂和個人自主的藍圖。當她在 1926 年寫《一個被解放的女共產黨員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時，她已經因爲自己的一些政治錯誤，而被外派到挪威當大使。在自傳中，她企圖將這種想法表達出來；然而，隨後而來的批判令她不得不刪除個人生活與想法的一些片段。她必須犧牲自我的私領域、尊崇黨的一切，以第一人稱複數－－我們－－的形式取代第一人稱單數－－我－－的主張。

第二種類型是政治犯女性自傳體回憶錄。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當蘇聯政府積極建立嚴格的排他性正統時，同時也製造出一種特殊的監獄經驗，以及由許多政治受害者所寫的一系列回憶錄。在史達林時代，肅反運動清除了許多政治人物和文化知識份子，也使得無數女性不是喪失所愛就是被捕、監禁或流放。史達林去世後的解凍時期，許多女作家投入反抗式自傳的俄國傳統；她們的反抗傳統結合了對史達林獨裁統治的痛恨，以自己、家人或朋友所遭受的迫害記錄其苦難歷程。這些女作家，如葉芙戈尼雅・金斯伯格(Евгения С. Гинзбург, 1904-1977)，最初只是想把個人的作品當成驅除惡魔（史達林統治）和復興共黨理想的工具；然而，她們反而記錄了人權是如何地被侵犯的主題，而非促進一個理想的政治綱領。

史達林政府的任意定罪，使她們重新評價自身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歷史。當她們被非法審判，丟入監獄和集中營時，這些女作家遇到了許多其它不同類型的女罪犯，例如，非俄羅斯

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或是女同性戀、雙性戀，來自不同階級的政治犯與普通罪犯等；不預期地，她們透過記錄其他被監禁女性生活的新角度與好奇心減輕了自己的痛苦。一般而言，這類自傳體的書寫與男性集中營的方式有極大的類似，大都缺乏自主性和團體歸屬感。無論如何，這些女作家敘述了其他女性的生活是某種有意義的舉動；不僅指出女性亦可將內在的價值分享給其他女性，更引導了某些社會價值的根本轉變，也就是更重視人權。這些女作家無形中促使「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社會遠離政治生活，用一種更深遠的理想取代對革命偶像的崇拜、犧牲與奉獻－－也就是回歸人性。

第三種，文化保護者的女性自傳體小說多半來自受迫害者的妻子或女兒，她們被形容成「俄羅斯的文學寡婦」（Beth Holmgren, ed. By Toby W. Clyman & Diana Greene 1994: 136），主要和男性作家有關，明顯地承繼了文化保護者的責任和力量。史達林政權就像摧毀生命一般，摧毀了無數藝術創作者的文本。有多少男性受到壓抑，就有多少女性承擔保護未通過檢查制度、非官方文本的艱鉅工作。事實上，她們的傳記也就成爲戒嚴時期非官方俄羅斯文化的保護者和捍衛者。例如，象徵派詩人曼德斯坦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1-1938)的妻子娜潔虛妲・曼德斯坦姆（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9-1980）、作家布爾加科夫(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的第三任妻子依蓮娜・布爾加科娃（Елена Булгакова, 1893-1970）等，這些文學寡婦努力保護男性作家的檔案，在適當的時機出版他們的作品，並努力恢復他們的名譽。她們的回憶錄通常採取生活札記的形式，復原過去歷史的事實，去反駁那些傷害男作家的真實性形象；也因此，這些紀錄顯得更具可靠性。過程中，她們經常扮演支持伴侶的角色，有時是秘書，有時是紀錄者；依蓮娜・布爾加科娃就是在 1926 年布爾加科夫的日記被搜查沒收後，開始代替丈夫寫日記。

在許多案例中，文學寡婦技巧而堅持地完成保護者的責任，但卻常缺乏專業訓練。即使她們具有專業訓練並自覺有能力去寫作，她們的自傳也僅僅忠實地反應蘇聯歷史的創傷，並確保俄羅斯男權文化結構的繼續存在；莉吉亞・楚科夫斯卡婭（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 1907-1996）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是個文學批評家、編輯、小說作家，認真地維護一些作家的形象，其中包括自己的父親－－科爾涅・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9）。她在父親死

後完成其作品《童年記憶》(Памяти детства, 1989)，重點放在 1910 年代的童年時光，其中包括描述她與父親相處的歲月；在當時嚴格的審查制度下，幾次嘗試出版都終告失敗。這部作品雖聲稱是自己的童年往事，實際上是強調「父親是她的創造者」，她用不同的角度表現和贊同父親「創造者的形象」；父親楚科夫斯基是她終生價值的建立者。透過她的生活詮釋，她詳細地描述父親如何賦予她具有價值的詩學教育並針對文學職業做早期訓練。

然而，遺憾的是，楚科夫斯卡婭對父親詳盡的描述卻限制與混淆了她對自己的描寫。作爲旁觀者，我們可以瞭解她對父親的敬畏與被父親認可的渴望。她的敬畏和服從暗示著一種自我的隱藏；她似乎接受父權下普遍被接受的兩性階級模式，並在無意中去除了模式之外的女性自我。這種被歸類爲「我們」的普遍模式，包括女性特徵的主要內涵：玩洋娃娃，看女生的書，像小婦人一樣做女人的工作，烹飪、洗衣，不要引人注目，遵守女人本分地維持一個家庭。因此，她的童年自傳完全縮短了自己的少女時期，在強調她的創造者－－父親－－卓越的貢獻時，卻完全遺忘了自己的自傳。

第四種類型是自我追尋者。這類女作家企圖打破「父權制」，也就是突破以男性家長中心之制度爲典範而建構之人類傳統體系、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二十世紀初，以撰寫詩歌見長之女詩人瑪琳娜・茨維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的自傳式散文提供了追尋自我的女性作家極有價值的啓發。Svetlana Boym 認爲她的作品是「一個不順從的女性的獨角戲」，詩人希望保持女性身份，但卻將之推到極限，反而違反了文學的女性和男性氣質的常規。在散文作品〈我的普希金〉中，與其談到她的詩人前輩、導師、啓蒙者普希金，不如說更敘述了自我內在的深處：異教、黑暗、吉普賽人、反抗的布爾加喬夫(俄國農民)、大海、自由與詩歌。在大膽的探究自我女性身份的同時，茨維塔耶娃幾乎將自己和所有 20 世紀初的女詩人劃分開，成爲最勇於違反當時俄國社會規範的女作家。

瑪莉亞・阿爾巴托娃(Мария Арбатова, 1957--)代表了女性主義運動正式在俄羅斯發聲，她的自傳小說《我的名字叫做女人》(Меня зовут денщина, 1997)、《我四十歲》(Мне сорок лет, 1998)描述了女性身分在俄羅斯社會的困境與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坎坷路程。

四、二十世紀俄國女革命家自傳體書寫

薇拉・芬格涅爾(Вера Фигнер, 1852 – 1942)

俄國政治活動家。1852 年出生於俄羅斯喀山行政區的一個農家，當時正值尼古拉一世執政。Вера 出生在一個奇特的家庭，家中連她共六個小孩，他們每個都在史上留名：有三個姐妹（維拉、莉季亞 Лидия 和葉甫根尼婭 Евгения）都是革命份子，最小的妹妹 Ольга 在被流放時，在西伯利亞結婚，一生致力於文教事業，而兩名哥哥 Николай 和 Петр 分別是優秀的歌手和工程師。

畢業於喀山羅季歐諾夫女子學院（Казанский Родион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благородных девиц），1970 年嫁給法院偵查員 Филиппов，並在隔年和他一起出國，於蘇黎世考上醫學系，在 1873 年，俄國政府要求在蘇黎世的學生回國，但她冒著被永久驅逐出境的可能去了伯恩，這件事造成了她和丈夫之間的裂痕，很快的他們在 1876 年離婚了。1875 年，國內的革命團體招喚她，她就拋棄了學業回到俄國，隔年她在聖彼得堡的喀山廣場參加了革命，她加入了在 1874 年從警察殲滅中倖免的革命圈，她後來在回憶錄中提到：「從二十四歲我的生命就和俄國革命黨密切相關。」

在《土地和意志》（Земли и воли）雜誌分裂後，加入了「人民的意志」委員會（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主導在彼得堡和 Кронштадт 兩地對大學生和軍人的宣傳，1879 到 1881 年間多次策劃、參加暗殺皇帝的行動，在 1881 年，亞力山大二世被暗殺成功後，她躲了起來，但在 1883 年，維拉因爲朋友的密告而行蹤曝露被逮捕，當時執政的亞力山大三世曾經高興地說：「我真高興這個恐怖的女人被抓到了！」經過長期審判後，Вера 被判無期徒刑，獄中她受到各式各樣的拷問，苦不堪言，入獄服刑的二十二年讓她受盡苦頭，但這段日子對她來說很重要，昔日那些革命份子在獄中的英勇行爲給了她撐下去的力量，強化了她的精神，也讓她的一生活得像個傳奇。她在獄中爭取寫作的權利，並在獄中寫詩；1904 年九月出獄後流放下諾夫哥羅德。

她在 1906 年出國，並出版在獄中寫的《長詩》，1907 到 1909 年參加社會革命黨，1915 年

回到俄國，但沒有參加 1917 年的十月革命，1920 年，她把俄國革命運動寫入《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й труд》，這是俄國最出色的回憶錄之一，但她是一個謙虛的、一點也不虛榮的女人，所以她在書中寫的並不是她自己在革命中扮演的腳色，而是她的同志和敵人們。由於這本書很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俄國發生的事件，受到高度評價，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使她一夕成名。

在她八十歲那年（1932）出版了她的作品集，總共有七冊，她寫下了在「沙皇的地牢」中恐怖的生活。最後她也沒有加入蘇聯共產黨，但大家經常把她直接當作是蘇共黨員。1942 年她過世後被葬在莫斯科。Герман Лопатин 說：「維拉不只屬於她的朋友，她屬於俄羅斯。」

耶娃・伯洛依朵(Ева Бройдо, 1876 -1941)

1876 年生於 Виленская 省的小城市 Свенцяны，1941 年死於 Орёл。本姓戈登，是 М. И. Бройдо 的妻子。從第一個丈夫的姓是 Эдельман，入黨的假名爲娜塔莎，文學創作用的假名是"Е. Львова"和"Е. Бронская"。

她十五歲通過四年級的中學測驗進入 Двинск 的藥房工作，而後通過藥劑師助手的考試。她在里加住過幾年，1896 年去了柏林，並在那裏認識了一些重要的德國社會革命家，受他們的影響下也成爲一個社會革命者。1899 年來到彼得堡，和工人組織有了接觸。當時倍倍爾（August Ferdinand Bebel，1840- 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支持巴黎公社，曾參與創建第二國際，晚年在戰爭、殖民觀點持中立態度）的《女人和社會主義》剛被翻譯成俄文，一出版就立刻被書報檢查列爲禁書，但她在讀了這本書之後開始相信社會主義，1899 年加入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РСДРП）。1900 年 Ева Бройдо 參加「社會主義者」團體，這團體後來和「彼得堡羅斯克的工人小組」（Петербургск. группой Рабочего Знамени）合併，她和其他人一起建立「工人叢書」（С.-д. рабоч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小組並且是維繫團體的重要人物之一。

作爲「工人叢書」的編輯，她用"Е. Львова"的假名寫了《1848 年法國的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1848 г. во Франции）和《俄國女工》（Русская работница）兩本政治宣傳小冊子。她的人生和政治信仰全寫在《俄國女工》（1917）中，她在書中呼喚著俄國女工：「必須要學習；必須積極參加工會和社會革命黨。現在我們不該等待別人追隨我們，我們是來打造自己的命運的，我

們應該要參加地方自治的選舉、並準備立憲會議的選舉。但在這同時我們應該記得，工人階級的利益，無論是男工人或女工人的利益，都是相同的，是和資產階級利益互相對立的」（c.16）。[43]

1901 年隨著小組解散，她在彼得堡被逮捕。在家中被拘留檢查時她生病了，1901 年八月八日她在警衛的擔保下被送往故鄉 Свенцяны（今名：Швянчёнис，立陶宛東部的城市），在她的組織下當地很快成立了社會民主工黨。她後來由於擅自離開維爾紐斯而被逮捕，被流放西伯利亞五年，參加了所謂的「羅曼諾夫示威」（Романовский протест）；1905 到 07 年的革命年間，她參加孟什維克的組織，在 1912 年被選爲孟什維克委員會成員和秘書，同時在孟什維克的「光」報（Луч）工作。1917 年二月革命後成爲全俄羅斯社民工黨的代表，並獲選進入中央委員會。

她在十月底參加與布爾什維克黨關於「共同的社會主義政府組織」的談判，1920 年離開俄國，爲「社會主義公報」工作，1927 年她秘密被送回俄國，但 1928 年在巴庫（亞塞拜然首都）被逮捕，被判三年徒刑，1931 年四月被流放塔什干，1935 年十一月在戈爾諾-阿爾泰斯克（Го́рно-Алта́йск，俄國西北部，1932 年時名爲 Ойрот-Тура），1939 年蘇聯莫斯科軍區的軍事法庭判她二十年牢房，1941 年蘇聯高等法院聯合審判官在例行檢查 Орловской 監獄中囚犯時，改判她死刑，她死後才被恢復名譽。

薇拉・拉蘇莉淇(Вера Засулич, 1849-1919)

她是七零年代革命運動中最知名的女革命家，並是「勞動解放」團體（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руда）的創立者之一，出生於軍官家庭。1878 年彼得堡市行政長官 Ф.Ф. Трепова 簽了對女革命家 Боголюбова 嚴刑的命令，Засулич 密謀謀殺，向 Трепова 胸口射了兩槍，使他受了重傷，她很快遭到逮捕。但在法庭上，她的誠懇、天真和女性特質獲得了陪審員的好感，所以雖然這樣的罪刑應該要被判十五到二十年牢獄，她卻被陪審法庭宣告無罪。

[43] 原文爲："Надо учиться; надо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ах 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Теперь нам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ждать, что за нас что-то сделают другие. Мы сами призваны кова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Мы должны принять деятель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выборах в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мы должны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выборам 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Но при этом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что интересы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целом, как рабочих, так и работниц, одинаковы и что эти интерес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интересам всех других буржуазных классов."

兩次僑居瑞典，第一次於 1879 年秘密返回俄國，參加建立民粹主義革命組織「Чёрный передел」，她是最早單獨進行恐怖行動的女革命家之一，也是最早對這種行動失望的其中一人。1897 年第二次僑居在瑞典，1883 年加入「勞動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руда）團體，致力於跨國工會的聯繫，代表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三度參加第二國際（конгресса Втор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的會議（1896, 1900 和 1904）。在此時她揚棄了過去的理念，加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行列。1894 年在倫敦從事文學寫作和研究，她這三年的文章內容包括歷史、哲學和社會心理學問題。1900 年參加《火花》（Искра）和《黎明》（Заря）報，並參與第二國際；1903 年在俄羅斯社民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加入孟什維克派，並在代表大會後成爲領袖之一。1905 年返回俄國。1905 年的革命後，約從 1907 到 1910 年，她成爲被肅清者（ликвидатор）之一。但從友人 М. Фроленко 寫下的關於她和 Засулич 會面的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Засулич 當時的生活狀況：「我一開門後所看到的景象立刻讓我想起從前。維拉・伊凡諾夫娜（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拿著書坐在堆滿各式各樣東西的書桌旁，窗邊、另一個桌上也都放著東西——茶壺、一些盛著吃剩食物的盤子和沒洗的杯子，角落放著髒衣服和一些沒用的東西，床也沒整理。一言以蔽之，維拉・伊凡諾夫娜所剩下的只有對自己的信念。」[44]

1917 年二月革命時，她被當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分子（буржуаз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1917 年和 Плехановый 一起參加孟什維克組織「統一」（Единство），一直到戰爭結束，並在四月時，寫了一封信給俄國民眾，要他們支持臨時政府。1917 年六月被選入彼德格勒臨時國會（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Временн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дума），她認爲布爾什維克「銷耗了很多錢，並消滅了大規模的工業」，[45]列寧批評她的行爲，但是也說 Засулич 是「最知名的革命家」。[46]

她曾對民粹派的戰友 Л. Г. Дейч 說：「活著很辛苦，但很值得」。[47]1919 年她的屋子發生火災，她失去了在祖國的一個角落和心愛的貓，七十歲的、已經不被任何人需要的她坐在階梯上大哭；後來與她住同棟樓的的兩姊妹收留了她，但她當時已經得了肺癌，死前她得了這樣的重病，但到最後一分鐘她還在寫回憶錄，她的回憶錄在死後出版。

她的文學作品不多，大多屬於歷史文學或文學批評。第一個出版的作品是波蘭 1931 革命

[44] 原文爲：«Картина, которую я увидел, отворив дверь в ее комнату, сразу напомнила прошлое.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с книгой в руке сидит за столом, заваленным всякой всячиной. На окнах, на другом столе лежат вещи, стоят чайники, тарелки с недоеденной пищей, немытые стаканы, в углу сложено не то грязное белье, не то хлам какой-то, кровать не убрана. Словом,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осталась верна себе».

[45] «истребляют капиталы, уничтожают крупн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46] «виднейшим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м»

[47] «Тяжело жить, не стоит жить»,

五十周年紀念演說稿。另外，她寫過研究盧梭和伏爾泰的專書，兩篇作品都在九零年代遷居時寫的，而後在俄國出版，文章在書報檢察刪去很大一部分。它們試著向馬克思主義者介紹這兩個思想家的學說和重要性。她還寫了第一本俄文的伏爾泰傳《伏爾泰。他的人生和文學活動》(1893)。1905 年革命後她爲生計翻譯 Г. Уэллс 的散文《Бог динамо》、《彗星的日子裡》（«В дни кометы»）、 «Человек-невидимка»等等，也翻譯伏爾泰的長篇小說《白牛》（Белый Бык）。

她的文學批評的文章包括：獻給 Степняк 的長篇小說《困難的時間》（"Трудное время"）、Боборыкин 的長篇小說"По-другому"，對彼薩列夫（И. Писарев）、多布洛六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俄國社會運動的歷史意義的比較和評價，她也和民粹派政論家進行論戰。她的文章中透露出很強的藝術鑑賞力，她能夠看出文學作品中藝術成分的不足（例如，可以從她對 Степняк 的《Андрея Кожухова》的評論中看出這點），但是所有她的文學批評文章都是政論作品，她很喜歡當中透露的俄國社會革命思想，並在文中加強革命的傾向、和自由的奮鬥。

歷珊德拉・柯隆泰 Александра М. Коллонтай (1872 – 1952, 79 лет)

柯隆泰是跨國及俄國社會革命運動家、女性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政府成員。她具有俄國、烏克蘭、芬蘭、德國和法國血統，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女性，是蘇聯時期最具謎樣的女性之一。從1890 年起她就開始參加革命運動，1906 年加入門傑列夫派，1915 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РСДРП）。她生性富有主見，批評官僚制度，在全俄代表大會上嚴厲批評分配不公開的問題，並要求把管理經濟的權力移交給生產者；在代表大會之後，她寫信給史達林，請求之後的工作，於是她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女大使，從1923 年擔任駐挪威全權商務代表，1927 年再度擔任挪威全權代表，1930 至 1945 年間擔任公使（посланник），之後擔任蘇聯駐瑞典大使。1945 年起擔任蘇聯外交部參贊（советник МИД СССР）受蘇聯政府委託，和芬蘭進行戰後談判。

柯隆泰出生在彼得堡小康的上校家庭，原想在瑞典受教育，但因故前往義大利，在那裏寫

了文章投稿報章雜誌，但未受刊載。她從很年輕就受到異性歡迎，她了拒絕父母的安排，不嫁給亞歷山大三世身邊的副官，而是嫁給遠房表哥 Владимир Коллонтай。他們過得很幸福，但她覺得不夠，她想要一些連自己也不懂的東西，她的一生顯示：她不追求安逸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很疼愛她，溫柔地滿足她所有願望，卻不限制她，給她了莫大的自由，放任她的羅曼史，雖然他們在 1898 年就離婚，但她一直到晚年還時常想念這個丈夫。

柯隆泰認識列寧、普列漢諾夫（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 – 1918, 革命家、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開創者）。1905 年她發現自己有演講的天賦，她說：「布爾什維克主義比較合我的心意.....但是普列漢諾夫的個人魅力抑制住了孟什維克的分裂。」[48]她參與地下組織的宣傳活動，在工人聚會上慷慨激昂地演說後認識了 Петр Маслов（社會黨人第一份合法報紙的編輯，強烈批評列寧）。他們秘密約會，但這沒有帶來快樂，在彼得堡 Маслов 很怕流言蜚語，所以在 Маслов 去德國演講期間，Коллотай 去了曼海姆（Mannheim, 德國西南部大城市），在那裏她能認識更多歐洲社會革命的菁英份子，但是其實重要的是那個在柏林等著她的男人。她所進行的革命運動受到上層的關注，她曾入獄，受到女作家 Щепкина-Куперник 的庇護。爾後，朋友們爲她準備好護照，她就逃離了俄國、離開彼得堡八年。Петр Маслов 帶著家人尾隨而來，他們的地下戀情在柏林繼續，但是她像其他逃難者一樣無法在同一地久留。對她來說只有自己、頭上的屋頂和工作桌是家，幸好她會多國語言，才能適應各國流亡的生活。和 Петр Маслов 的越來越庸俗化的羅曼史漸漸成爲她的負擔，她也不想與他結婚，於是前往巴黎。在巴黎租了簡約的小公寓中的一間房間。在 Лафаргов 追悼會上她認識了 Александр Шляпников（無產階級革命者），喪禮後他走向她，執起她的手親吻，之後他們在城裡散步。當時他 26 歲，而她 39 歲，日後她寫道：「這個開心的、毫不掩飾的、直爽又剛強的年輕人很討我喜歡。」認識他之後，她就和 Маслов 分手了。她寫了離婚信給丈夫 Владимир Коллонтай，並在丈夫早就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書上簽名，讓她的丈夫也能和所愛並同居很久的女人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她覺得 Шляпников 在一起很幸福，此時她覺得自己真正是個女人，這份感情甚至讓她更了解生命和工人問題。後來 Шляпников 要完成列寧交代的任務常常不在家，回家之後卻常常干擾她工作、寫作，之間有了不愉快。

柯隆泰後來又被逮捕了一次，在朋友費盡心思救出後逃到瑞典，但在她離境之後，被逐出、

[48] "По душе ближе мне был большевизм... но обая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Плеханова удерживало от разрыва с меньшевиками." 原文在：Хронос. 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 http://www.hrono.ru/biograf/bio_k/kollontay_am.php. >

禁止回國的通知和以前男朋友 Саткевич 結婚的消息讓她大受打擊，得了憂鬱症，她在作品中寫下孤獨和無助。此時美國邀請她去演講，因爲列寧收到她轉贈的書並試著在美國爲她出版。她在美國的演講非常成功，她走遍 123 個城市演講，報紙寫道：「Коллонтай 征服了美國」！[49]

她加入"Солдатская Правда", 雜誌"Работница" (Петроград), 報紙"Волна" (Гельсингфорс)，並出版《Кто такие с.-д. и чего они хотят?》(1917) 小冊子；此外她寫過很多書：«Избр.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1972)、«Из моей жизни и работы. Восп. и дневники»(1974)、«В тюрьме Керенского»(1928)。她寫了很多關於女性革命的文章，提倡一種「新女性」(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認爲新女性不只要從男人那裏得到物質，還要得到他們對自己（女性）的存在的關心；新女性不會隱瞞自己的性慾，應服膺於情感；新女性會爲利益階級服務，而不是只關在家裡，只關心家庭和愛情。「工人階級有很大『流動性』，兩性的交際正好有著低穩定性，它甚至間接成爲工人階級的主要任務之一」。[50]事實證明，她用傳奇的一生來完成自己的這些理念。

五、二十世紀俄國女性集中營自傳體回憶錄 — 以金斯伯格《險峻的路程》爲例

我認為：記載所有這一切是自己的使命。主要不是為了陳述這些年在集中營與勞改營所發生的事實，而是為了向世人揭露女主角的精神演變過程，從一個天真的共產理想主義者轉變成一個嚐盡善惡之樹果實的人；一個在尋找真理過程中經歷無數新的磨難與痛苦而恍然大悟的人。更重要的是讓讀者瞭解，這是一段個人內在《險峻的路程》，而不僅僅只是一部受難的編年史。[51]（Е. Гинзбург

[49] "Коллонтай покорила Америку!"

[50] «Дл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большая „текучесть“, меньшая закреплённость общения полов вполне совпадает и даж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ытекает из основных задач данного класса.»

[51] Гинзбург Е. *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 АСТ, 2007, с.829-830. 本論文作品文本引言皆出自此書，之後引言將僅標示頁碼。

Как бы там ни случилось, а я считала своим долгом дописать все до конц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изложить фактиче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дальнейших лет в лагере и ссылке, 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читателю раскрылась внутренняя душевная эволюция героини, путь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наив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идеалистки в человека,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 вкусившего от древа

2007: 829-830）（本文作者譯）

金斯伯格的小說《險峻的路程》結合了個人見證與精神自傳，是最早一部透過俄羅斯婦女的遭遇，描述史達林時期勞改營生活的小說，這部長達八百多頁的長篇小說被視爲俄羅斯女性自傳體和回憶錄文學的主要作品之一。這部小說一開始從不公正的社會恐怖和隨之而來的逮捕（1934-1937）寫起，描述了作者因受到史達林的整肅，而在廣大的蘇聯境內度過監禁、勞改與流放的十八個春秋。最初三年間，她曾跨越數萬哩，更換了六次不同的監禁獄所，每次的處境都愈加艱險，生命岌岌可危，數度瀕臨死亡邊緣。

身爲大學教師，與丈夫皆爲韃靼地區高級共黨幹部，金斯伯格自始至終都堅信共產主義理想；然而，卻在 1937 年，史達林大整肅期間，因反革命罪名被逮捕，真正的原因是她被視爲托洛斯基的支持者。她在被單獨監禁 730 日後，又被押到科雷馬勞改營，接著在 1947 年被流放到遠東地區的馬加丹，隨後於 1951 年再度被關進勞改營，1956 年才恢復名譽。

在這本回憶錄中描述著：她一方面受到押者不擇手段、無恥的訊問，同時也感覺到自己不被動搖、堅毅的道德勇氣；有同僚的背叛，也有獄友間的憐憫與友誼；有人在專橫和暴力面前的束手無策，也有歷經苦難後的精神淨化；有面對折磨的幽默，也有洞察靈魂的感動。她以優美的措辭、敏銳的洞察力、驚人的記憶與形象生動的對話，記述了這段傷痕歷史。這本作品可以說超越了一般的紀實寫作，獲得女性自傳體詩學的藝術成就。

一般而言，俄羅斯文學在作家、哲學家和社會政治活動家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換句話說，作家所寫的也常被認爲是社會和歷史過程的一部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流亡作家索忍尼辛認爲：蘇聯時期反抗書寫的特徵是，作家運用自身的經驗來挑戰官方運用權力對國家正義與社會道德做統一詮釋的歷史（Jane Gary Harris(ed.) 1990:4）。金斯伯格的作品也繼承了這一傳統，但更重要的是它呈現了女性觀點的反歷史，這個觀點強調在古拉格群島（指蘇聯時代的集中營）裡，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人際間互相依賴與共生關係的人性原型與百態。

познания добра и зла, человека, к которому через все новые утраты и мучения приходили и новые озарения (пусть минутные!) в поисках правды. И этот внутренний "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 мне важнее донести до читателя, чем простую летопись страданий.

作者的回憶錄特別強調女性意識與心理感受，表現的方法也與男作家不同，描述的重點常放在男權體制下女性之間的互相依賴關係。文學批評家 Sidone Smith 觀察到，「男性用個人主義的、客觀的、疏離的方式表現自我、他者、時間與空間；而女性則用人與人彼此間的、主觀的和直接的方式表達經驗（Sidone Smith　1987: 13）」。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 Babara Heldt 在研究金斯伯格的作品時融入了性別的考量，在比較她和索忍尼辛手法的時說道：「金斯伯格在描寫難堪的殘忍時，也可以找到人的心靈：這是她主要的目標。她不斷地和其他受害者聯繫，不僅賜予他人生命，更給予自己求生的勇氣（Babara Heldt 1987: 153）。」

1.　跳脫「群體代言」的敘述手法

回憶錄最突出的特點在於女主角的故事並非控訴史達林集中營殘暴事實的案例代表，並非作爲許許多多受難者的代言人，而是眾多受難個案之一；也就是說，她和其他被權力踐踏的人是站在平等的地位。此點和索忍尼辛筆下的伊凡・丹尼索維奇（小說《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的主角）將自己與其他人區分出來，有著顯著不同的敘述觀點。金斯伯格運用的手法是將與她共同分享集中營與放逐生活的眾人交織成不可分割的一體，她的敘述不是爲女性講話，而是把自己當成千千萬萬女人之一，她敘述的是一個特殊蘇聯女人的故事。這個女人的地位是由政治、經濟、社會階級界定的：被捕前，享有特權、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是一位歷史學家、老師與記者，還是一名高階共產黨員，更是那些有意利用革命後的政策，來提昇婦女地位、促進社會解放和知識平等的時代新女性之一。這個國家體制和社會文化所代表的則是，每一個人必須否定自我性格與私領域生活，強行將自我意志納入社會集體的共同目標；女性則被推入自己無法改變的社會系統。換言之，在當時的國家與社會背景下，女性的自我縱使能夠跳脫男性意識的「他者的我」，亦無法逃脫男性集體體制下的「另一個支配者的我」；儘管金斯伯格能夠擺脫「女性群體」的他者，保存著她獨特的「女性自我」，但是這個「女性自我」還是陷入另一個「他者」的影響或圈制。

然而，金斯伯格的地位在被逮捕後有了急遽的改變。一萬名女性在鎮壓中被捕，她們組成一個集體，她是集體中可區別的一份子。金斯伯格的敘述將焦點放在女性政治囚犯的相互關係上，雖然由她個人敘述，不代表她代表或包含了女政治犯的整體。相對來看，在索忍尼

辛的小說中，對男主角伊凡・丹尼索維奇與其他集中營夥伴生活瑣碎的描述，模糊了其他囚犯的焦點，有意凸顯男主角的反抗形象，並以此作爲囚犯的集體代言者。

2. 主角內在的精神發展

金斯伯格在被逮捕前後的思考模式與精神發展有截然不同的對比。逮捕前，她深信權力當局所有言行，並視爲典範；逮捕後，對他們的粗暴、無道德與高壓的意識形態徹底失望，她必須仰賴其它的信仰來支撐自己。這種巨大的衝擊直接影響到她的思考模式與精神發展。首先，在精神體系內，她必須重新審視原本的信仰。她回憶起逮捕前的生活，反省起來，發現當中充滿了虛假。浮上腦中的第一件事是她與丈夫爭論爲何高層大肆逮捕黨員時，雙方發生爭吵，無意間摔開丈夫的手時，弄丟了一隻金錶，真是場景歷歷：

我們彎腰，空手在雪堆裡裝著找手錶，試圖緩和氣氛。事實上，在我們因爭吵而激動的臉上，可感受到佈滿即將到來的災難陰霾。最可怕的是，我們彼此都清楚對方在想什麼：我們只是假裝手錶不見而生氣，決定一定要找到它。其實，我們根本顧不到手錶；真正遺失的是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各自還裝作這個爭吵對個人很重要，這才是我們所要擔心的。事實上，我們夫妻之間的爭吵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已經處於生活之外，不再擁有普通人共同生活的關係了，只是這種潛在的想法並沒有對自己說出來而已。[52]（c. 39）（本文作者譯）

另一件事，發生在家庭共同生活的最後一個休假日。在黨員的渡假村裡，聚集了許多高階黨員，同時也有許多「統治階級的小孩」（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дети）（c. 39）。小孩們根據車子的

52 В наших позах, когда мы, склонившись над сугробом, разрывали его голыми руками, в наших лицах, взбудораженных ссорой, уже чувствовалась тень вплотную надвинувшейся катастрофы. Самое страшное было в том, что 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читал на лице другого отчетливую мысль: ведь мы только делаем вид, что расстроены пропажей часов 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хотим найти их.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 нам не до них. Ведь пропала жизнь. И еще каждый делает вид, что эта ссора важна для него и волнует. А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что значит ТЕПЕРЬ супружеская ссора? Ведь мы уже вне жизни, вне обычных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 это был только подтекст, не высказанный даже самим себе.

品牌將周遭人的身份分類：林肯（Линкольнщики）與別克（Бьюишники）的身份較高，福特（Фордошники）的身份較低，作者屬於後者。

金斯伯格將上述兩個事件並列，兩種意象是這本小說的中心基礎：後者暗示她日後的命運，透過小孩對車子的印象，在反映大人身份的社會評價之餘，也隱含著權力的危機；前者關於遺失手錶則是表達時間與空間的失落。

逮捕對金斯伯格的第二種改變是思想模式的轉變。原本被黨培養成壓抑情感，運用邏輯思考，現在卻必須依靠直覺思考。例如：在面對被逮捕的威脅時，她後悔沒有接受農婦婆婆聰明的建議，躲到鄉下。隨著時光的飛逝，金斯伯格漸漸瞭解這個建議的智慧，以及當時因政治天真而忽略這個建議所犯下的錯誤。

原本是理性的共產黨員，現在所有的認知都受到挑戰。金斯伯格最後試著透過與身邊的親朋好友的關係，來重新評價自己的行爲，檢視自我的成長；也就是透過對環境改變的調適，對自己重新定位。被逮捕後的第一個自我覺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被迫必須獨立分析周遭情勢與選擇應採取的行為路線（c. 70）（本文作者譯）。」[53]基於這個覺悟，她請年長她十歲、黨齡大她 15 年的獄友蓋勒（Гарей）解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時，而蓋勒的回答反而令她更困惑；而蓋勒最後的下場是被槍決。

另一個事件是女黨員皮特可夫斯卡雅（Питковская）的悲劇。她是一個忠於黨的女同志，不自私，辛勤工作。在 1927 年丈夫加入反對黨後，她深感愧疚；然而，她深愛丈夫與年僅五歲的孩子，在丈夫被逮捕後，她失去黨裡的工作。當她被下放到工廠工作時，弄傷了右手，最後自殺。「望著皮亞可夫斯卡雅悲慘的墳墓，沒有十字架，也沒有星星覆蓋。我知道，不，我絕不這樣做。我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鬥。他們也許會殺了我，但我絕不幫助他們（c. 24）（本文作者譯）。」[54]金斯伯格默默地在心理告訴自己：皮亞可夫斯卡雅順從男性的集體意志模式不會是她的例子。於是，金斯伯格從蓋勒與皮亞可夫斯卡雅身上得到的結論是：要爲自己著想。

3. 時間與空間的描述

---

53 Впервые в жизни передо мной встала задач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обстановки и выбора линии поведения.

54 Увидав этот жалкий холмик без креста или звезды, я поняла: нет, я не сделаю так. Я буду бороться за сохранение своей жизни. Пусть убивают, если смогут, но помогать им в этом я не буду.

金斯伯格回憶錄的俄文版與英文版分別說明了小說的兩個主要基調：俄文版是以史達林與崇拜者做爲書的封面，書的副標題－－「個人崇拜時期的歷史」（хроника времен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而英文版則有意省略副標題，以金斯伯格被監禁、勞改的路線圖和集中營的地圖作爲封面。這一個對照令人想起已故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Михаил Бахтин, 1895-1975）提出的「時空體」（хронотоп）論述，當中深入討論文學中藝術表現的時間和空間的內在關聯。本文將不針對這方面做探討，而將重點放在時間與空間對性別之影響，強調女性表達時空關係的不同方式。

一般而言，女性自傳體文學多將空間侷限於家庭，而金斯伯格的回憶錄卻是個特殊的例子。她並非自願地脫離家庭空間，而是在心靈上被強行推入一個「蘇聯」的信仰情境和寬廣的空間，並且在身體上被遷到家庭以外的封閉空間，度過大部分的生命；她的行動自由被集中營與嚴酷的氣候所限制，她的旅程（靈魂的險峻路程）和空間息息相關，並且是自我精神探索的必要條件。

其次是時間與人的關係產生了巨大的變化：被監禁後的時間突然停滯，與外在世界的斷裂讓作者感覺到茫然和窒息。

冬天。我坐在這裡想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知道這裡的監獄與拷問嗎？
我現在幾乎無法想像外面世界的真實景況，例如夏天的時刻，有某個人此刻
正在河裡游泳。[55](c.223) （本文作者譯）

我們生命的時鐘停止了，每天帶給我們的《北方工人》報紙，提供遙遠的外在訊息，在當時是極端無聊的隻字片語，泛著蒼白的反光，無法啟動知覺的時鐘。我們基於慣性還是貪婪地死抓著報紙，比校對者還要認真徹底的讀著它。然而，報紙上所寫的對我們的認知完全是不真實的。
「戰爭到了西班牙、慕尼黑；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黨準備召開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這一切都

55 Зимой, сидя здесь, я все думала о внешнем мире. Знают ли там об этих застенках? Пытках?
А сейчас я почти не верю в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ого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Почт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верить, например, что сейчас лето и кто-нибудь вот в этот самый момент купается в реке.

是在夢中嗎？難道現在還有戰爭？難道其他人不是像我們一樣被摧垮了？隨著每天的到來，不斷出現這種完全與現實隔離，預知接近終結的危險感覺。[56](c.227) （本文作者譯）

再者，便是空間的改變，個人不再享有私自的空間，被強行關押到一個改造與懲罰「想法不同者」的角落。金斯伯格被逮捕後，牢房竟成爲一個分享姊妹情感的地方，來自不同背景的女人在此分享她們（困境的）肉體與精神的空間。一直到被關在各自牢房兩年後的一次共浴時刻，作者才親眼看到除了室友外的其他牢獄夥伴，雖然這段期間她們彼此隔牆傳達訊息，卻無法親見彼此。作者感性地描述到：

她們多可憐，由於悲傷而清瘦，疲憊不堪……就像我們一樣。消瘦的身軀喪失了女人的圓潤，眼睛裡有著熟悉的表情－－和我們一樣。

我們再也不躲藏，不再分彼此。相反地，他們命令我們兩人排成一隊，我感受到一種熱切的姊妹之愛與忠誠……。[57]（c. 240）（本文作者譯）

之後，作者甚至惋惜即將離開和牢友尤拉（Юля）一起住過的牢房：

---

56 Часы наших жизней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и их не могли пустить в ход те бледные отсветы далекого чужого бытия, которые приносил нам ежедневно "Северный рабочий", не ахти какой грамотный, очень развязный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стерпимо скучный листок. Мы, правда, по инерции хватали его все с той же жадностью, мы все так же вычитывали эту газету куда тщательней, чем ее корректоры. Но все, что она сообщала, уже воспринималось нами как не вполне реальное.

Бои в Испании. Мюнхен. Гитлер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Восемнадцатому партсъезду. Не во сне ли все это? Разве на свете еще кто-то борется? Разве не всех так сломили, как нас?.. С каждым днем росло это опасное, предвещавшее близкий конец чувство полной отрешенности от всего живого.

57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жалкие, измученные, прогоркшие от горя... Такие же, как мы. Исхудалые тела потеряли женскую округлость, в глазах знакомое выражение - то самое.

Нас уже больше не прячут и не отделяют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Наоборот, нам приказывают строиться в пары по две, и я с чувством горячей сестринской любви и преданности.....

把該既定的變動即將面臨執行的這件事丟到明天。讓我們（作者與尤拉）在這單獨的牢房中再多住一兩天；畢竟就在我們這個房間裡留下來一小塊我們的心靈。在這裡我們曾高興地談論著書籍，也在這裡共同記憶著童年。我們不能突然就這麼離開這裡。[58]（c.242）（本文作者譯）

儘管如此，在另外的例子裡，空間並沒有迫使金斯伯格馴服，而是讓她重新燃起對個人尊嚴的渴望。

現在，從我們最後一次跨越自己囚室門檻那天起，我們必須全部綁在一起，包括工作、做夢、進食、洗澡、身體機能的需求——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是共同的、集體的。許久以來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膽敢夢想自己能獨處，儘管一分鐘也好。[59]（c.243）（本文作者譯）

之後，金斯伯格被轉到開放的外在空間，有時和其他的女囚被派去砍樹，有時被派到農場、廚房、醫院、育嬰所和學校工作。有一次被安排集體睡在農場木板上，她燃起了該睡在自己獨自小房間的念頭，對獨立空間需求的想法將她帶回身爲人的尊嚴；也使她被流放到馬加丹（Магадан，俄國遠東地區的一州）時，努力設法改善自己的住處，並重建自己的家庭。

金斯伯格對集中營空間的理解可分爲兩個世界：第一個是大世界，涵蓋了整個古拉格體系。這個世界的空間是由階級、權力、統治權的他者來支配決定的。她用奴隸與主人的關係來描述這個世界。第二個是小世界，是女性犯人分享他者痛苦和恥辱的共同空間。她則運用各種表達身體與心靈結合的地點來描述第二個世界，例如：共同的牢房、運送火車和船的空

58 пусть бы уж на завтра совершилась
та решающая перемена, которая предстоит. Пусть еще хоть два-три дня мы пробудем в этой одиночке, в НАШЕЙ одиночке. Ведь в ней остается кусок нашей души. Здесь мы иногда так радостно общались с книгой, здесь мы вспоминали детство. Ведь нельзя же так сразу.

59 Теперь, с того июньского дня, когда мы в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переступили порог нашей камеры, мы должны были держаться ТОЛЬКО все вместе. Работа, сон, принятие пищи, мытье в бане, отправление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 все это было теперь общее,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Долгими, долгими годами никто из нас не мог теперь и мечтать о том, чтобы остаться хоть на минуту наедине с самим собой.

間、集中營的各個交會點。後來，當金斯伯格獲得暫時的自由後，這個主題又重複出現，第一次是和監獄與集中營的老友尤拉分享房間；第二次是她在簡陋房子裡爲自己第二個脆弱的家庭尋找公寓住所。

除了空間對人的外在與內在發揮極大影響力外，自然環境也給予人極大的考驗。當金斯伯格面對嚴苛的自然環境時，她無法像一般冒險英雄小說中的男主角一樣，接受自然環境的挑戰，測試自己的極限，而只能宿命地接受它。在送往集中營一個月可怕的海上航行後，面對未來生或死的命運，金斯伯格只能像個教徒似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天空開始呈現丁香花般的淡紫色。我在科力馬（Колыма，位於俄屬遠東地區）的第一個黎明就要到了。突然之間，我感到一種神奇的輕鬆，並接受了我的命運。的確，這是個殘酷的異鄉。無論是母親或是兒子都不可能找到前往我墳墓的道路。不管如何，至少這是陸地。我終於抵達陸地，我不再恐懼鯊魚出沒的灰色太平洋。[60]（c. 325）（本文作者譯）

之後的回憶錄中亦可讀到作者面對大自然的類似心境，譬如，對於西伯利亞自然的膽怯與畏懼，而非征服。

4. 對身體的關注

異於男性反抗式書寫的另一項特點，就是女性作家特別關心身體的困境。在男性寫作傳統裡，通常認爲精神應高於肉體經驗，甚至高過個人生命。別於男性傳統，金斯伯格以女人爲中心的世界，對肉體同時也表達了相當的關注。她在面對身體的痛苦時，強烈地表達了恐懼與焦慮。

在作品中，金斯伯格特別觸及女性身體的議題，尤其是身體上的傷害。在審問前原本身

60 На небе забрезжили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оттенки лилового и сиреневого. Близился мой первый колымский рассвет. Я вдруг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а странную легкость и примиренность с судьбой. Да, это чужая и жестокая земля. Ни моя мать, ни мои сыновья не найдут дорогу к моей могиле.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земля. Я добралась до нее, и мне больше не угрожают кишащие акулами свинцовые воды Великого, ил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體狀況尚佳，然而，在一連串不分晝夜、折磨人的審問後，驟然惡化。她問道：「這是惡魔的陰謀要把我從 30 歲的女人變成 100 歲的老太婆嗎（c. 87）」？[61]另一次，單獨與施暴的警衛搏鬥後，她用勉強獲得的一點水清洗身體，她才覺得自己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骯髒的動物（c.197）。[62]回憶錄中，也經常提到對惡劣環境和疾病的恐懼，擔心停經、乳癌…等問題。

除了擔心自己身體所受的傷害，金斯伯格同時也關心其他女獄友的身體狀況。由於被警衛欺負、抵抗、極差的飲食、缺乏飲水、過度的勞動、惡劣的環境與氣候等因素，在監獄或集中營中女人的身體狀況都明顯惡化。這些女犯人必須面對身體的共同問題，也表達了彼此之間的關係，緣因於共同面對生存、死亡、疾病和毀滅的恐懼。

另外，特別突出的就是觸及性本能的議題。雖然集中營生活使這些女犯人喪失女性原有的特質與性能力，但是也引發另一種個人和集體的反抗。例如：女犯人偷偷保留逮捕前所穿的衣服，避免警衛查到；在送往遠東的前一晚，女犯人們共同去浴室洗澡，這些對她們來說是種樂趣。即使冒著被抓的風險，她們還是尋找自由的性樂趣，這對被強暴的議題而言是種消極的反抗。和索忍尼辛的小說相比較，金斯伯格在這方面的描述更爲敏銳和沈痛，因爲她本身就是受難女性的一分子。女性在集中營中存活下來的人數較男性多，但她們也付出較高的精神和身體上的代價。

5. 母親與孩子的關係

母親和孩子（包括非親生子女）的關係是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個基礎，此點通常被反抗書寫的男性作家忽略。回憶錄中不斷重複著作者對自己失去「母親身份」的恐懼，增加小說人道精神的感傷。金斯伯格想到可能被判處死刑時，說道：「他們怎麼能沒有任何理由就殺了我……我是作為媽媽的茬紐什卡（Женюшка：金斯伯格的小名），是阿列夏（Алёша）和瓦夏（Вася）的母

61 Неужели все демоны сговорились сделать мо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ее сердце сразу столетним?

62 Кружка грязная, заржавленная, вода подернута каким-то сальным налетом.
Я жадно хватаю ее, выпиваю два глотка, а остальной водой умываюсь. Экономно, аккуратно отмываю руки и лицо, потом вытираюсь верхним краем рубашки. Вот. Теперь я снова человек, а не грязное затравленное животное.

親……誰給他們權力（c.156）（本文作者譯）」？[63]

白天理性的擔心敵不過黑夜非理性猜忌的折磨。也許，某些人邪惡的意圖讓我即將失去我的孩子？阿列夏已經不在了……瓦夏——我那即將熄滅的生命的最後火花——會不會飛走、殞滅在雲端，或者消失在空氣中。再一次，在這惡夢連連的夜晚，我的耳邊似乎響起絕望的聲音：沒有人會再叫我媽媽了。[64]（c.653）（本文作者譯）

與孩子的連結同樣也延伸了與母親的關係。1949 年聖誕節當天，金斯伯格的母親去世；在那種情況下，她對母親再多的懷念都是無指望的，此處母親和女兒的聯繫只能表現在視覺上，所有母親寫給她的信都被拿走了，只剩下兩張照片保留記憶。作者想到母親爲了設法尋找她的生死與下落，所經歷的折磨與痛苦，作品中敘述道：「她是個完全不會被別人特別描述的平凡母親。一個被囚禁罪犯的母親。在這些年老、孤寡、無家的歲月裡，她完成了沉默忍耐的成就（c.703）」。[65]

同樣的連結也延伸到其他女犯人的母子關係。金斯伯格在作品中也一再提到女性囚犯彼此間被禁止討論有關孩子的話題；這種禁止反而使她們更絕望，她們沉默的悲傷和失望是某種共同的束縛。金斯伯格年幼的孩子住在集中營的「兒童之家」（Деткомбинат），而她也曾經非常幸運地被分配到該處工作一年。回憶錄的第二部談到集中營中被遺忘的角落，當中描述那些與母親一起被流放的孩子們，被拘禁、單獨安置在「兒童之家」的情景。

---

63 Ведь немыслимо же поверить, что меня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коро убьют. Ни с того ни с сего... Меня, мамину Женюшку, Алешину и Васину мамулю... Да кто дал им право?

64 Но все эти дневные разумные опасения были ничто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ночными темными мученьями, лежавшими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рассудка. Может быть, чьей-то чудовищной злой волей я обречена на гибель моих детей? Ведь Алеши уже нет, нет... А Вася - последняя искорка моей угасающей жизни - не то летит и гибнет где-то в облаках, не то просто растворяется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 снова, как в кошмарные эльгенские ночи, стучит в моих ушах формула отчаяния: меня никто в жизни не назовет больше мамой.

65 Она была совсем рядовой, никем не описанной матерью. Матерью заключенной. Свой безмолвный, неосознанный подвиг она совершала уже под старость, уже во вдовьи, бездомные свои годы.

兒童之家也是集中營的一區。有值班室、大門、簡易的房舍和帶刺的鐵絲網。在房舍們上寫著簡單的字：『餵奶孩子』、『爬地嬰兒』、『年紀稍大的』……。

開始幾天我似乎回到過去。突然讓我又恢復了哭泣的能力。三年多來我的眼睛熾傷至無淚的絕望。但是現在，1940 年七月，我坐在這棟奇怪建築角落的長凳子上哭泣。無法停止的哭泣……孩子們喚起了我的本能，我想要把他們集合起來，緊緊地抱住，讓他們不要受到傷害。……，你們是我親愛的……你們是我可憐的人兒……。[66]（c.379）

兒童之家的寓意是雙重的：經由兒童之家的工作，金斯伯格重新拾回了母親的身份；另一方面，她也必須面對在侷限空間成長下的孩子，他們是受傷的、被遺忘的無辜受害者。在兒童之家的孩子們營養不良，不被關心，甚至四歲小孩還不會說話，只會發出一些「呀」、「呀」的聲音；哭鬧、模仿和打架是他們主要的溝通方式。他們經常挨餓，吃飯時就像個小囚犯，聚精會神的，匆匆忙忙的，用一塊麵包，盡力地抹乾鐵碗中的殘羹飯菜。這些孩子即便生存下來，對父母的痛苦也不會有移情作用，更不會嘗試去保留他們的回憶。

回憶錄的第二部談到金斯伯格與小兒子瓦夏在馬加丹試著重建第二個家庭。回憶錄中母親與孩子的聯繫是雙重的：他們不僅是生育的、循環的聯繫，更是文化、歷史、線狀的聯繫。孩子就像是個人創作的作品，是人類最持久的希望，也是女性創造者現在和永恆之間建立的橋樑。從這個角度來看，金斯伯格的作品也就像是自己的另一個小孩，會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

---

66 Деткомбинат - это тоже зона. С вахтой, с воротами, с бараками и колючей проволокой. Но на дверях обычных лагерных бараков неожиданные надписи. "Грудниковая группа". "Ползунковая". "Старшая"...

В первые дни я попадаю в старшую. Это вдруг возвращает мне давно утраченну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лакать. Уже больше трех лет сухое отчаяние выжигало глаза. А вот теперь (в июле сорокового) я сижу на низенькой скамейке в углу этого странного помещения и плачу. Плачу без останову..... Они пробудили во мне ата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нкты. Хотелось собрать их всех вокруг себя, стиснуть покрепче, чтобы ни один не попал под удары молнии..... Да вы ж мои касатики... Да вы ж мои головушки болезные...

6. 結論

歷史是人類的共同記憶，它以何種姿態呈現，傳統以來，常常反映出權力者的私心與慾望。任何想要操控的力量，利用意識形態的編織或是意圖塗抹真相，最後終究落入一定的困境；像金斯伯格這一類的作品就是它們最大的挑戰。權力的話語是許多時期的歷史與文化所特有的，在俄羅斯帝國與之後的蘇聯共產帝國的語境裡，爲了政治目的而奪取話語權力，一向在多層次的歷史情境中無所不在。從俄羅斯以外的其他加盟民族，到異議分子，到婦女的世界，都是以「他者」的次文化呈現，有意識地視而不見，或者乾脆鎮壓、監禁、勞改與放逐。從這個角度來看，金斯伯格在反抗式自傳體回憶錄中建立了雙重價值，一是反對史達林對個人自由與人權的任意踐踏，是記錄被遺忘的歷史傷痕，另一則是建構了有異於俄國傳統反抗式書寫的女性模式；吾人深信，這部自傳回憶錄必會在歷史的記憶中留下足跡。

六、 文學寡婦：以莉迪亞・楚科夫斯卡雅（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 1907-1996）《童年記憶》爲例

莉迪亞・楚科夫斯卡雅（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 1907-1996）1907 年生於聖彼得堡，父親爲作家柯爾涅・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9）。畫家列賓（И. Репин, 1844-1930）與柯爾涅一家人維持著良好的關係，楚科夫斯卡雅遂稱列賓爲「另一個父親」（другой мой отец）。[67]除了列賓，當時彼得堡的畫家、作家、演員、詩人經常造訪柯爾涅府上，因此楚科夫斯卡雅自幼對於安德烈耶夫（Леонид Андреев, 1871-1919）、科羅連柯（В.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等作家就很熟悉。1920 年代，由於柯爾涅主掌各式出版職務，楚科夫斯卡雅自詡很幸運在青少年時期能聽聞布洛克（А. Блок, 1880-1921）、古米廖夫（Н. Гумилев, 1886-1921）、阿赫瑪托娃（А. Ахматова, 1889-1966）、高

[67] **參見楚科夫斯卡雅自傳**，（http://www.chukfamily.ru/Lidia/main.htm）。

爾基（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左琴科（М. Зощенко, 1895-1958）等作家。

1926 年夏天，大學二年級的楚科夫斯卡雅被指控參與反蘇聯活動而遭到逮捕。儘管這是項莫須有指控，作家在自傳中聲明自己與該活動毫無關係，但當時她仍被判處三年的流放刑責。楚科夫斯卡雅被流放至東南方城市薩拉托夫（Саратов），後來由於父親柯爾涅從中說情幫忙，流放役期由三年縮減至十一個月。

1928 年，楚科夫斯卡雅進入「列寧格勒兒童出版部門」（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Детиздата）工作，時任主編爲詩人、翻譯家瑪爾沙克（С. Я. Маршак, 1887-1964）。

1929 年，嫁給文學史家沃里培（Ц. С. Вольпе, 1904-1941），生下一女伊蓮娜（Елена Цезаревна Чуковская, 1931-），1933 年兩人離婚。楚科夫斯卡雅之後再婚，嫁給化學家布朗什坦（М. П. Бронштейн, 1906-1938）。

1935 年初，楚科夫斯卡雅因爲先前提早結束流放而遭到中央單位「點名」，要求她成爲「內務人民委員會」（НКВД）一員。據作家說法：「儘管審訊漫長、出言不遜、恫嚇威脅，我依舊挨了過來：我沒被擊倒」。[68]

然而，1937 年八月產生遽變：丈夫布朗什坦遭到逮捕，隨後楚科夫斯卡雅在瑪爾沙克的出版社工作的幾位密友也被逮捕，其餘未遭逮捕的人，包括楚科夫斯卡雅在內也難逃被解職的命運。作家曾透過各式方法打探丈夫下落，卻始終毫無音訊；直到 1957 年，楚科夫斯卡雅才收到官方正式的死亡通知，上頭標註的死亡時間爲 1938 年二月十八日。然而，作家在自傳中提出丈夫並非自然死亡（умер），而是被中央政府下令槍決。

1938 年秋天，楚科夫斯卡雅開始頻繁地與詩人阿赫瑪托娃見面，並開始抄寫記錄下彼此的會面，甚至默背記下詩人的詩作，其中包括《安魂曲》（Реквием）。1964 年，阿赫瑪托娃授權楚科夫斯卡雅收集她的詩作，集冊出版。1965 年，《時間的脫逃》（Бег времени）問世。1966 年詩人過世後，楚科夫斯卡雅著手整理幾年來與阿赫瑪托娃往來的相關手札記錄，並印製出版《關於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札記》（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然而囿限於蘇聯當局的壓制，該作僅在西方發行：第一卷發行於 1976 年，第二卷則是 1980 年。

楚科夫斯卡雅本身也從事創作。1939 至 40 年創作首部小說《索菲亞・彼得洛夫娜》（Софья

[68] 同註 1，原文為：Несмотря на длительный допрос, брань, угрозы, мне удалось устоять: меня не били.

Петровна），作品旨在探究悲劇性的三〇年代，直到 1965、66 年，該作於巴黎及美國發行。[69] 第二部小說《沈入水中》（Спуск под воду）創作於 1951 至 1957 年，故事內容再次涉及三〇年代的史達林恐怖鎮壓及「世界主義」（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議題，該小說只在西方世界發行。此外，她也以筆名「阿列克謝・烏格洛夫」（Алексей Углов）寫作童書：《列寧格勒－－奧德薩》（Ленинград – Одесса, 1928）、《關於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中篇小說》（Повесть о Тарасе Шевченко, 1930）、《伏爾加河上》（На Волге, 1931）。1940 年，作家以本名出版兒童歷史小說《一段起義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故事內容陳述十八世紀的烏克蘭農民起義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楚科夫斯卡雅飄泊於俄羅斯各地：她與女兒及外甥被迫遷徙到奇斯托波爾（Чистополь），之後又搬到塔什干（Ташкент），她在當地從事文學出版及兒童援助工作。1943 年秋天，作家抵達莫斯科；1944 年列寧格勒圍城戰之後，楚科夫斯卡雅嘗試返回列寧格勒，然而計畫未果。

楚科夫斯卡雅遂留在莫斯科從事各式文學相關工作：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出版社主導詩歌部門;五〇年代末期,在附屬於作家協會的高等文學課程(Высш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урсы при Союзе Писателей）進行教學工作。

楚科夫斯卡雅曾多次申請進入作家協會，卻也多次遭拒，直到 1947 年才被納爲一員，然而作家的會籍只持續到 1974 年：因爲楚科夫斯卡雅遭指控在海外出版刊物、參與 BBC、《美國之聲》等廣播節目的錄製，公開聲援巴斯特納克（Б.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索忍尼辛（А. Солженицын, 1918 – 2008）、薩哈洛夫（А. Сахаров, 1921-1989），因此遭作家協會除籍。

柯爾涅・楚科夫斯基曾云自己的女兒爲「天生的人道主義者」（врожденная гуманистка）。[70] 自六〇年代開始，楚科夫斯卡雅開始接近俄羅斯知識分子、作家及學者，聯手反抗無理的暴力政權。

楚科夫斯卡雅多次起身聲援索忍尼辛，作家馬洛佐夫（А. Морозов, 1944）曾發表〈女鬥士：莉迪亞・楚科夫斯卡雅〉（Воительница Лидия Чуковская）一文，作家於文章自述受到楚科夫斯卡雅的英勇行徑感召，而主動捎信給她，表達敬意。從魚雁往來的信件中讀者可以獲悉女

[69] **楚科夫斯卡雅在自傳中提到，巴黎發行的版本內容遭到扭曲，而美國版本則如實呈現。**

[70] 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5 т. Т. 11: Дневник(1901-1921) / Предисл. В. Каверина; Коммент. Е. Чуковской. М.: Т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6. с 11.

作家對於自身遭遇的看法：她認爲被作家協會除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пустяки）；以及政治態度：她認爲索忍尼辛遭作家協會除籍是「祖國的民族恥辱」（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зор нашей Родины）；還有女作家的健康狀態：到了晚年視力退化，她多次在信件中表示閱讀與書寫對她而言相當吃力。[71]

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隨著蘇聯政治風氣走向開放，楚科夫斯卡雅塵封良久的作品也開始出現在俄國讀者眼前；此外，她也積極投入維護父親柯爾涅・楚科夫斯基的遺產保存：蘇聯官方曾多次逼迫楚科夫斯卡雅及女兒搬離「楚科夫斯基之家」（дом Чуковского），並嘗試拆除該博物館。但是在作家的努力之下，該博物館依舊保存至今。此外，她於 1989 年出版回憶錄《童年記憶》（Памяти детства），書中記錄作家對於父親的回憶。

楚科夫斯卡雅於 1996 年二月七日於莫斯科溘然長逝。

七、孤獨的獨唱者：瑪琳娜・茨薇塔耶娃（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

茨薇塔耶娃出生於莫斯科，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茨薇塔耶夫（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Цветаев）爲莫斯科大學教授，魯緬采夫博物館（Румянцевский музей）館長、普希金博物館（Пушкинский музей）創辦人及藝術品收藏家：母親梅伊恩（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Мейн）有波蘭、德國血統，是名熱情澎派的音樂家及詩人，母親時常在家中演奏名音樂家的作品、爲孩子朗誦詩歌、說童話故事，從小沐浴於家庭的書香氣息之中，茨薇塔耶娃曾云：「有了這樣一位母親，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爲一名詩人」。[72]受到母親影響，茨薇塔耶娃成了詩人，但她與母親的關係並不親密，母親的暴躁脾氣在母女之間劃了一道隱形的疆界；此外，茨維塔耶娃在自傳中寫道：「母親本身像首詩。我是長女，但是她愛的女兒不是我。她以我爲榮，但愛的是二女兒。不足的愛造成早年缺憾」。[73]文評家史朗寧（M. Слоним）認爲母愛的缺乏致使茨維塔耶娃不停地找尋女性友誼，例如捷克友人安娜・切絲克娃（Анна Тескова, 1872-1954）。切絲克娃較茨維塔耶

[71] **關於馬洛佐夫的文章請參見**：(http://www.chukfamily.ru/Lidia/Memories/Morozov.htm)。

[72] **茨維塔耶娃著，汪劍釗主編，《茨維塔耶維娃文集．小說戲劇》。北京：東方出版，2003，頁 1。**

[73] “Мать - сама лирическая стихия. Я у своей матери старшая дочь, но любимая - не я. Мною она гордится , вторую - любит. Ранняя обида н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сть любви.” Цветаева М., ред. Саакянц А. А., Мнухин Л. А. *В завтра речь держу... :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1925-1937*. М. Вагриус. 2004. с. 15.

娃年長許多，但是後者在前者身上找到了母性的溫暖與關愛，因此這段友情對詩人而言猶如心理補償。[74]

1902 年秋天，十歲的茨薇塔耶娃跟隨生病的母親到了義大利北方濱海城鎮 Nervi，茨薇塔耶娃在那裡第一次接觸到俄羅斯革命人士及關於革命的各種思考想法。至 1906 年母親過世之前，茨薇塔耶娃先後在瑞士洛桑、德國等地生活、就學。她也在段時期書寫德文詩歌，當時她最喜歡的一本書是德國童話作家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的《Lichtenstein》。

1906 年，進入女子寄宿學校就讀，廣泛閱讀十九世紀的經典俄羅斯文學，如普希金、萊蒙托夫與涅克拉所夫的詩作，但是她不喜歡托爾斯泰與杜斯陀耶夫斯基，根據史朗寧的回憶錄記載，茨維塔耶娃曾開玩笑表示，假如有一天流落到無人島，她會帶列斯科夫（Н. Лесков）與阿克薩可夫[75]（С. Аксаков）的小說；[76]此外，她也接受德國詩人歌德、海涅等德國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以及法國文學如雨果、司湯達爾的創作，結合童年時期的家庭教育涵養，該時期的茨維塔耶娃的創作能量正日益強化。

1910 年，十八歲的女詩人發行第一本詩集《黃昏紀念冊》（*Вечерний альбом*），該書收集的作品寫於十五至十七歲，這部詩壇處女作受到了前輩如古米廖夫（Н. Гумилев）、沃洛申（М. Волошин）的注意，後者甚至親自前往拜訪初出茅廬的女詩人，並爲她撰寫一篇具有份量的評論文章，兩人因此建立起友誼關係，開始魚雁往來，分享創作心情。[77]

1911 年，透過沃洛申，茨維塔耶娃認識了丈夫艾伏隆（Сергей Эфрон），兩人於隔年完婚，[78]茨維塔耶娃特地將第二本詩集《神燈》（*Волшебный фонарь*）獻給丈夫，但是這部作品並不如首部詩集的成就，文壇詩人們皆給予不好的評價。1917 年，艾伏隆受徵召入伍，從此音訊全無，直到 1921 年，作家愛倫堡（И. Эренбург）獲悉艾伏隆依然生還，居住在捷克布拉格，他遂寫信給茨維塔耶娃。[79]1922 年，女詩人離開祖國與丈夫團圓，往後的十七年，她輾轉遷徙於德國、法國與捷克，直到 1939 年她才帶著家人返回蘇聯，根據自傳，茨維塔耶娃是爲了給兒子格奧爾吉（Георгий Эфрон，小名爲「穆爾」（Мур））一個祖國，才因此返回蘇聯。[80]

---

[74] Л. Мнухин, Турчинский Л. (сост.), *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 М.: Аграф, 2002. с. 95, 96.

[75] 主要描寫自然風光與大自然活動，如狩獵、釣魚、捕蝶等家庭軼事。

[76] 同註 3，c.106.

[77] **信件內容請參考**：http://az.lib.ru/w/woloshin_m_a/text_0340.shtml。

[78] **兩人起先育有兩個女兒阿莉亞（Аля）與伊林娜（Ирина）。隨著艾伏隆赴前線作戰，加上社會局勢動盪，造成茨維塔耶娃的生活困厄，作家迫於生計遂將兩個女兒送到育幼院。後來大女兒阿莉亞因病被送回家，三歲的二女兒卻因饑荒而餓死在育幼院。**1925 **年兒子格奧爾吉出生，對於詩人一家人是個奇蹟。**”*Георг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Эфрон. Горькая участь воскресного принца*”，http://s-makarenko.narod.ru/articles2.html。

[79] **愛倫堡著，馮南江，秦順新譯，《人．歲月．生活》。廣州：花城，**1998**，頁** 90**。**

[80] **同註** 2**，**c. 17.

閱讀同代人對於茨維塔耶娃的評論發現始終不脫離「孤獨」（одиночество）一詞。客居歐洲期間，詩人與俄羅斯僑民界的往來不甚密集，她沒有追隨任何文學團體或是流派，有一回她的詩集受到古米廖夫批評，她遂回應：「現在只有戈羅杰茨基（С. Городецкий）與古米廖夫在罵我，他們倆都是某個詩歌行會的成員。如果我在行會裡，他們就不會責罵我了，但我是不會加入到行會裡去的」。[81]愛倫堡也在回憶錄《人·歲月·生活》（*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中述及茨維塔耶娃的「孤鳥」性格：「她從少年時代起直到去世始終是孤獨的，她的這種被人遺棄同她經常脫離周圍的事物有關：『我愛上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然而是以分別，而不是以相會；是以決裂，而不是以結合去愛的』」。[82]

詩人一家與俄僑界的疏離也肇因於政治因素。丈夫艾伏隆於三〇年代加入親蘇的「回歸聯盟」（Союз возвращения），該組織受到蘇聯內務部的管控，艾伏隆也因此捲入了內務部於境外的兇殺及偷竊活動，於是他被迫逃出法國，這件事在僑民界傳開來，他們一家人被以「莫斯科間諜」看待。[83]

流亡海外期間，茨維塔耶娃一家人的經濟生活十分拮据，緊繃的日常生活也造成寫作的困難。詩人的妹妹安娜史塔西亞曾於二〇年代後期到巴黎與姊姊重逢，安娜史塔西亞在回憶文章中詳細記錄了姊姊瑪琳娜的巴黎生活：「餐桌上發生了一件令瑪琳娜與謝寥沙（註：艾伏隆的小名）失望的事：爲了表示對我的敬意，桌上端來千辛萬苦買來的牛小排，他們從不買牛小排，煎牛肉佐金黃馬鈴薯，但是我已經吃素五年了」；[84]「晚上，瑪琳娜躺在睡覺的小沙發上（我只記得她的房間有沙發、她的桌子與書籍），煙卷的煙霧繚繞，而她的眼中噙著淚水：『我該如何寫作？一早我上市場買食物，爲了預算斤斤計較，當然，我們都買最便宜的，全部買完，拖著籃子回家，一個早晨都過了；現在我要打掃、煮飯（阿莉亞當時帶著穆爾去散步），等所有人吃飽、打掃完，當我躺下睡覺時，一片空白，一個字都沒寫！一早又急急忙忙做家事，日復一日....』」。[85]

安娜史塔西亞離開法國當天，瑪琳娜臥病在床，無法親自送行。離去前，安娜史塔西亞叮囑艾伏隆一家人重回俄羅斯，艾伏隆則將瑪琳娜寫給妹妹的信交給她，信中充滿了姊妹情深的深厚情感：

一只信封與柳橙。（好大一比開銷啊，瑪琳娜！）

---

[81] **阿格諾索夫著，劉文飛，陳方譯，《俄羅斯僑民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2004，頁 352。**

[82] **同註 8，頁 93。原文：**С отрочества до смерти она была одинокой, и эта ее отверженность была связана с постоянным отталкиванием от окружающего: «Я все вещи своей жизни полюбила и пролюбила прощанием, а не встречей, разрывом, а не слиянием»

[83] **同註 10，頁 353。**

[84] Л. Мнухин, Турчинский Л. (сост.), *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 М.: Аграф, 2002. с. 244.

[85] **同註 13，頁 245。**

淚水充滿眼眶，致使我無法閱讀。

「親愛的阿霞〈...〉當您離開時，我久佇窗邊。殷切盼望能再看到您站在轉角，您的身影應該在那裡搖曳。但，顯然，您走了另外一條路！我在家中來回走動，流著老年人的貧瘠淚水...」。[86]

這是兩姊妹最後一次見面，三〇年代初期，安娜史塔西亞被逮捕，遭流放至西伯利亞及遠東集中營；而詩人瑪琳娜則於 1939 年六月十八日返回莫斯科。返回祖國並未終結詩人的孤寂生活，日子反而更加艱辛：女兒阿莉亞被流放（直到 1955 年才重獲自由）、丈夫艾伏隆遭指控從事反蘇聯活動而被槍決。這段時日，茨維塔耶娃除了進行文學翻譯工作，她也擔任廚工、清潔工等工作來貼補家用。

1941 年八月，隨著納粹進逼莫斯科，詩人與兒子移居至韃靼共和國的小城葉拉堡（Елабуга），但是詩人的精神與物質生活漸趨敗壞，八月三十一日她選擇上吊自殺。從留給兒子的遺書中，可以窺見詩人生前的精神壓力以至崩潰邊緣：「小穆爾，請原諒我，再這樣下去只會更糟糕。我病的很重，我已經不像我。我熱切地愛著你。請你了解，我已經無法再活下去了。如果你還能見到爸爸與阿莉亞的話，請幫我轉達：直到最後一刻我都愛著他們，請幫我解釋，我陷入人生的絕境之中」。[87]

綜觀茨維塔耶娃的創作，讀者可以發現她的人生經歷濃縮於創作母題之中。在遠走他鄉的日子裡，她以俄羅斯民間素材、口語風格爲創作元素寫作詩歌及散文，表達對於祖國的懷想（如散文《我的普希金》（*Мой Пушкин*）、詩歌《致普希金》（*Стихи к Пушкину*）、《好樣的》（*Молодец*））；流亡期間，她也將詩作獻給她曾經佇留的城市，其中她對於捷克的喜愛更甚於其他地區，遂寫成詩歌《致捷克》（*Стихи к Чехии*）。此外，「愛情」與「死亡」也是詩人筆下的創作題材：從早期到晚年的創作，茨維塔耶娃「都在幻想著傳統的、永恆的家庭幸福，她厭倦孤獨和『無家的感覺』」；[88]詩人對於死亡的態度是坦然的，她認爲死亡是生存的合理結束，她以平靜的哲學態度面對生命的終結。[89]

八、叛逆的女性主義者：瑪莉亞・阿爾巴托娃（Мария Арбатова 1957 - ）

[86] 同註 13，頁 256。

[87] Мурлыга! Прости меня, но дальше было бы хуже. Я тяжело больна, это уже не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безумно. Пойми, что я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ла жить. Передай папе и Але — если увидишь — что любила их до последней минуты и объясни, что попала в тупик.

[88] 阿格諾索夫著，劉文飛，陳方譯，《俄羅斯僑民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2004，頁 359。

[89] 同上註，頁 365。

瑪莉亞・阿爾巴托娃（Мария Арбатова 1957 - ）1957 年出生於穆隆（Муром），一歲時搬到莫斯科。基於原則考量，阿爾巴托娃沒有加入共青團（комсомол）。年輕時是個活躍的「嬉皮」（активный хиппи）。中學就讀於莫斯科大學新聞系附屬青年記者中學（Школа Юного Журналиста при факультета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ГУ），大學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哲學系、高爾基文學院戲劇部（отделение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мени А. М. Горького”）。此外，她從 27 歲開始修習心理分析課程，心理分析在她往後的創作生涯佔了很重要的份量。

阿爾巴托娃童年受小兒痲痺症所苦，導致她的左腿行動不便。當時的醫院不給予兒童止痛藥；她也曾經因爲醫生的疏忽，差點遭受節肢。她的父母親接受建議，將女兒安置在小兒痲痺症孩童專屬的寄宿學校，在學校中的所見所聞，讓她體悟到這個世界是建築在狹隘的權力及荒唐事之上，[90]也從此埋下她往後成爲社會議題發聲者的因子。此外，父親是阿爾巴托娃從小的榜樣，但是父親在她十歲時過世，而母親也有自己的問題，無法悉心照料阿爾巴托娃，於是她從小就學會獨立自主，照顧自己。阿爾巴托娃很早就獨立生活，她住在阿爾巴特街（Арбат）上的集合公寓裡，這也成爲她的筆名由來（她的原姓是：Гаврилина）。

她的生活經驗及學術背景體現於文學創作力：她完成多部小說、舞台劇劇本、電影劇本、詩作及評論，並獲得許多文學獎項的肯定。[91]

大陸學者陳方提出：阿爾巴托娃的創作風格屬於「新自然主義」。該風格在主題上涉及從前在文學界遭到噤聲的議題，關照日常生活中的負面現象。陳方以阿爾巴托娃的短篇小說《爲不愛的人墮胎》（Аборт от нелюбимого）爲例，該小說牽涉的生育及墮胎等生理現象是女性新自然主義風格的特色。在文學中有專屬於女人的場所，提供給她們交流意見的專門場域：例如「廚房」[92]及醫院走廊（《爲不愛的人墮胎》、《我的名字叫女人》（Меня зовут женщина））。

自上世紀八〇年代起，俄羅斯文壇出現許多女性作家，形成一股勢力強大的「女性文學」。大陸學者孫超將阿爾巴托娃列爲女性文學作家之流，並論阿爾巴特娃將女性文學作爲「當代

---

[90] **參見**：”Maria Arbatova: Russia's Chief Feminist”，**網址**：http://www.russiajournal.com/node/856 。

[91] **阿爾巴托娃的創作列表，參見**：http://www.arbatova.ru/new/。

[92] **阿爾巴托娃在長篇小說《今年我四十歲》中提到：「蘇聯的廚房，就是一個女性王國，它是新人道主義標準、精神空間和自由思想的象徵」。**Арбатова М. Мне сорок лет. М. 2000, с. 193. **轉引自陳方，〈20 世紀 80 - 90 年代俄羅斯女性小說創作的風格特徵〉，2005.**

女性渴望自由地表現自我的合理需求」，同時也是「捍衛自己獨特的女性世界觀的有益嘗試」，女性文學是諸位女作家利用藝術手段實現上述觀念的方式。[93]

阿爾巴托娃爲俄羅斯首位自稱「女性主義者」（феминистка）的人。她關注女人的性自主權、墮胎權利，男女在職場及政治參與的發展性，同時也主張娼妓合法化。[94]阿爾巴托娃倡導的女性主義觀念並非空想，她結合自身修習心理學的經驗，從醫學及心理層面探究人類的性需求。在訪談中，阿爾巴托娃也建議受婚姻關係所苦的人應該尋求心理醫生的協助。阿爾巴托娃曾云心理學分析幫助她成爲自己的生命主人；[95]甚至，心理學分析也與她的創作及女性主義主張皆有緊密的關係。

除了筆耕創作， 阿爾巴托娃也曾投入杜馬選舉；組織名爲「和諧」（Гармония）的社團，旨在治療女性心理症狀；擔任近五年《共同報》（*Общая газета*）的觀察評論員；主持電視女性脫口秀節目「我自己」（Я сама），阿爾巴托娃便是在這個節目中首次表達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縱使身爲女性主義者，她卻認爲自己不是爲了女性權益而戰，反倒比較像是領導女性參與政治，教導女人懂得思考、懂得捍衛自己的權利，而不只是一味地爲她們做事。[96]

阿爾巴托娃離過兩次婚，現在的第三任丈夫爲印度人。她表示前兩段婚姻的終結皆與社會問題有關：第一任丈夫無法成熟地面對國家變動，於是陷入憂鬱，而把所有問題丟給妻子處理；第二段婚姻的結束則與國家杜馬選舉相關，當阿爾巴托娃陷入風暴，需要丈夫的保護時，後者卻無法給予保護。因此當她結束第二段婚姻時，她的兒子開玩笑說：「媽咪，妳需要一個比妳還強的男人」，阿爾巴特娃卻自嘲：「要去哪找這種男人？普丁都結婚了」。[97]

阿爾巴托娃主張男女平權，卻也引起了爭議。2008 年，巴荷米娜[98]（С. Бахмина）於獄中懷孕，遂提出假釋請願，大眾輿論陳情至總統梅德維捷夫，請求總統「做一件善行」（совершить акт милосердия），釋放巴荷米娜。阿爾巴托娃就此事發表評論：她認爲既然憲法之前男女平

---

[93] 孫超，〈俄羅斯是否存在「女性文學」？〉，2005。

[94] 見：”Ещё раз о легализации проституции”，（http://www.arbatova.ru/publication/6.html）。

[95] 見：”Интервью с Марией Арбатовой”，（http://www.greenmama.ru/nid/1322206）。

[96] 原文：Я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занимаюсь защитой прав женщин, поскольку не возглавляю правозащит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Я возглавляю «Клуб женщин, вмешивающихся в политику», и скорее учу женщин думать и защищаться, чем делаю это за них.（http://www.1news.az/interview/20081104095934074.html#page2）。

[97] 見：”Мужчины Маши Арбатовой”，（http://gazeta.aif.ru/_/online/sv/197/03_01）。

[98] 前俄羅斯尤科斯石油公司（ЮКОС）法律部副主任。2004 年因侵佔公款及逃稅而被逮捕；2006 年被判處六年半刑責；2009 年，提前假釋出獄。相關資料來源：http://lenta.ru/lib/14162184/。

等，那麼女人犯罪也應該付出同樣的代價，不能因爲懷孕或是性別因素，而使憲法規範形同殘廢。[99]作家托爾斯泰娅（T. Толстая）撰文抨擊阿爾巴特娃的說法，她認爲阿爾巴托娃意欲打擊巴荷米娜，女人嘲弄女人是很可惡的一件事。[100]

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俄國讀者對於阿爾巴托娃有著兩極化反應：有人認爲她的主張會破壞家庭制度；但也有人認爲她是女性模範。 阿爾巴托娃至今仍繼續從事寫作，她也在自己的網站論壇與讀者們交流互動，[101]在論壇上可見負面批評，但是作家仍會進行回覆討論，可說是一位與社會有所互動的當代作家。

九、結論

歷來，許多學者都曾深入探討過個人的主體建構或自我的身份認知。無論從何種角度切入，都認爲主體或自我是在歷史及社會中的認知被型塑；它是一個在社會實體背景下，透過不斷對外在環境的認知，而建構自我身份的過程。在不同的情境下，人被建構成爲知識、權力、道德的主體論述。其中最大的矛盾在於人通常相信自己是具有自我意識的自由主體，而且認爲自由是先驗的，但另一方面，個人的自我意識卻常常受到社會的制約，於是生存及生活的種種條件影響了自我的建構，也因而產生了族群、性別、階級等自我身份的認同問題。

傳統以來，一般人都直覺地相信，我們今天所接受及所表達的知識與真理，其實都是在男性爲文化支配者的歷史中慢慢形成的。男人根據他們的所知與見解，建構了主流學說、撰寫歷史、設定價值；一直以來，這些價值的表達與敘事都成爲男人和女人依循的準則，事實上，其中都明顯包含著男性的偏見。過去，很少人會去關注或留意女性的學習、認知及價值模式；不管是天生的本質，或是對社會環境的適應，它們確實與男性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過去的父權社會，男性中心的社會體系素來重視理性和客觀價值的文化氛圍裡，刻意貶低女性的心智與貢獻，普遍認爲女性的思維較爲情緒性、直覺性與主觀性。

---

[99] **見**：”Женщины должны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нест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http://liberty.ru/groups/rights/ZHenschiny-dolzhny-v-polnoj-mere-nesti-otvetstvennost-za-prestupleniya)。

[100] **見**：”Принцесса индийская”, (http://tanyant.livejournal.com/32742.html)。

[101] **參見**：http://www.marbatova.ru/UltraBoard.cgi?action=Category。

基於既有的支配關係結構及歷史陳跡，只有跳脫父權支配，透過女性的主體建構及自我表述，才能讓女性的學習、認知及價值模式真實顯現。也因此，探索女性自傳體書寫不僅有助於瞭解女性話語與敘事模式，更可發覺女性主體或自我建構的軌跡。對於當今強調差異、多元、異質性、邊緣性的後現代社會，這種探索更希望性別研究能以多元、開放的態度有助於女性「型塑主體」及「培養成熟的自我」，進而促成實質的兩性平權及性別文化的共生，攜手推動人類文明的進化。

參考文獻

（一）

中文：

1. M. M. Bakhtin 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尼采著，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利意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3. 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4. 笛卡爾，王太慶譯。《談談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5. 楊正潤。《傳記文學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6.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1998。
7. 錢鐘書。《寫在人生邊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英文：

8.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10.
9. Benveniste, Emil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iami: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Press, 1971.
10. Edit. by Clyman, Toby.& Greene, Diana. *Women Writers in Russian Literature.*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11. Heldt, Barbara. *Terrible Perfec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Kerby, A.P. *Narrative and the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 Kollontai, Alexandre. trans. by Attanasio, Salva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14. Lacan, Jacques. trans. by Fink, Bruce. *Ecrits.* 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7.
15. Maurois, André. *Aspect of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16. Probyn, Elspeth. *Sexing th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7. Rosenfield, Israel. *The Invention of Memory: New View of the Brain.* New York Basic, 1988.
18. Sacks, Oliver. 'Neurology and the Soul',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37, no. 18 (Nov. 22, 1990) .
19. Taylor, Charles. *Source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 Thompson, E.M.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0.
21. Ulric, Neisser. 'Fine Kinds of Self knowledg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988, pp. 35-59.
22. Zanden, James.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87.

俄文：

1. Гинзбург, Евгения С. *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 АСТ, 2007.
2. Пушкарёва, Наталья. *Гендерная 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ни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07.
3. 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Вольный проез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1.
4. Чуковская, Лидия. *Памяти детства.* （印自電子書）

網路：

Бахтин, М.М.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Literat/Baht_AvtGer/index.php (2011.04.26)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2%B3 (2011.02.20.)

（三）

1. Thompson, Ewa M.著，楊德友譯 (2009) 《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 Heldt, Barbara (1987) *Terrible Perfec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3. Holmgren, Beth (1994) “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 Russian Women’s Autobiography” in *Women writers in Russian Literature*, ed. by Clyman, Toby W. & Greene, Diana.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4. Stanton, Domna (1984) *The Female Autograp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biography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Гинзбург, Евгения С. (2007) *Крутой маршрут.*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 АСТ.

附件二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已將部份研究成果陸續發表相關論文於期刊，並收錄部分文章於專書《她們的足跡：二十世紀俄羅斯女作家作品研究》中

1. 劉心華，2010.09，〈歷史的傷痕記憶－金斯伯格《險峻的路程》：女集中營回憶錄〉，《文化越界》，第1卷第4期，頁97-119。
2. 劉心華，2012.01，〈從主體建構理論探討二十世紀初俄國女作家的自傳體書寫〉，《政大俄語學報》，第 19 期，頁 89-110。
3. 劉心華，2012.10，《她們的足跡：二十世紀俄羅斯女作家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ISBN：978-986-03-3709-9

其餘研究成果亦將繼續撰寫論文發表。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新歷史主義指出，歷史充滿斷層，歷史由論述構成。以傅柯的概念，我們應透過各種論述去還原歷史。換句話說，歷史並不是對史實單一的記載，亦並不是對於過去的事件的單純的紀錄。德西達(Derrida)也說：「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我們都透過這種結構再理解整個世界。因此，文學中的自傳體作品與回憶錄成為研究特定歷史時空的另一種佐證。從這些自傳體或回憶錄的作品，吾人可以拼貼出各時代社會及文化氛圍與圖像。

作者近幾年來持續研究俄羅斯文學中的性別問題，從各個男作家與女作家的不同角度來建構俄羅斯文化中的兩性觀，也發現其重要性。然而，卻發現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在俄羅斯與國外像是被擦拭掉的歷史記憶，呈現失語狀態，相關研究極其缺乏；造成了對二十世紀俄羅斯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某些失落。由於本議題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計畫之執行有其重要性與現實意義，亦具有其特殊性。

本計畫研究除了發掘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之特色外，亦拼貼出二十世紀女性視野的俄羅斯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空間圖像。

計畫亦達成下列成果:

1. 建立台灣有關俄羅斯性別研究、俄國女性作家研究之資料庫。
2. 為台灣學術界在該領域研究奠定基礎。
3. 增進國內女性文學、性別研究、文化研究之視野。
4. 提昇台灣在該領域研究的國際化水平。

附件四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04－033－MY2		
計畫名稱	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劉心華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副教授
出國時間	100 年 06 月 19 日 至 100 年 07 月 04 日	出國地點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女性研究(Women Studies)學系

一、移地研究過程

美國華盛頓大學婦女研究學系爲世界婦女研究學術重鎮之一，提供各個民族與國家女性在性別、種族、階級、年齡等層面問題的研究框架。該系以社會學爲導向，焦點放在全球性婦女議題，並著重跨國女權分析、亞洲和美洲婦女相關生活研究，其中包括歷史、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文化研究。此次在該校研究期間，主要針對自傳書寫中自我敘事主體身份及敘事方式議題進行研究，並搜集相關資料。

二、研究成果

一、　自傳中自我敘事的主體身份

自傳中自我敘事的主體身份經常是捉摸不定、混淆不清的模糊狀況。它通常徘徊於作者＼敘述者＼主角之間非絕對的重疊關係；作者本人可以忠實地記錄、描摹自我，也可假自己的名字敘述別人的故事，因此，法國傳記作家莫洛亞(Andre Maurois)在《傳記面面觀》(Aspects of Biography)中羅列傳記不可靠性的種種證明。美國自傳理論研究專家埃金(Paul John Eakin)在《我們的生活如何變成了故事》(How Our Lives Become Stories: Making Selves)對於自傳主體身份的梳理有較詳盡的分析。

在自傳情境中，敘述人是作者爲了使事件的進程能夠合理地邏輯發展，所設計出來的說書人；然而，自傳作者操縱著主人公和敘述人，所講述的故事也常常和寫作主體自身有不著邊際的情形。無論

自傳是以第一人稱爲主角，敘述別人的故事，或講述與作者本人面目全非的「我」的故事，嚴格說來，它實質上都是別人的傳記。在自傳文本的自我描述過程中，無論是變形的自我，還是講述他人，自傳體的敘事雖然企圖建構一個與作者本人一致的主體，但是，最後呈現出來的圖像只能看到那個主體的一個側面，充其量只能說，類似作者的影子。

表面來看，自傳體是對自我經歷的事件敘述，其敘述過程概都牽涉到對寫作主體的認識、理解與闡釋；然而，經過了一段時間和空間的轉移，人在過濾相關認識之後，其認知往往與客觀的事實內涵產生偏離，甚至有不準確的情形。

如此看來，自傳體的作家經過認知、體認後的行爲和行動，往往離當時事件發生的事實有一段距離，有時甚至是虛構的，實在難以歸爲任何文類。因此，自傳既不是寫實，也非完全虛構。客觀一點來說，自傳體其實只是一個漂移不定的敘述場域，在文本的事件敘述中交錯混雜著主體、自我和作者三種概念。

有關自傳主體與自我論述相關的資料有：

1. Maurois, Andre. *Aspects of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2. Eakin, Paul John. *How Our Lives Become Stories: Making Selv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3. Eakin, Paul John. *Fictions in Autobiogra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Eakin, Paul John. *Living Autobiographicall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Sprinker, Michael. *Fictions of the Self: The End of Autobiograp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Kerby, A.P. *Narrative and the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7. Rosenfield, Israel. *The Invention of Memory: A New View of the Brain.* New York: New York Basic, 1988.

二、 自傳敘事方式

自傳的敘事方式最常採用的是獨白形式。獨白技巧在戲劇與小說中廣泛被運用，多以直接引語的形式表述。無論敘述者是否隱身到幕後，都希望直接向受話者表達內心的思維。在意識流小說作品中，獨白多以自由間接引語的形式體現，即沒有引號，省略引述語，直接引用人物的話語表達方式；這類獨白通常稱爲內心獨白。內心獨白與傳統獨白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就內容而言，內心獨白表現人物潛

意識的深層思維；就形式而言，它的語句形式呈現無法再簡略的短語。

無論那種獨白本質上都具有對話性，這一點可從俄國文藝理論學者巴赫金(М. Бахтин)的「對話理論」得到證明。巴赫金認爲所有語言都是對話性的，每一句話語(utterance)形成之前都預期有一定的聽眾(audience)（包括自言自語），都隱含著對聽眾的期待，期待聽眾對話語產生某種反應(response)。巴赫金認爲，人的思想即爲與設想的聽眾（包括自己）之間進行的對話，我們每個人個體的內在就包含了各種聲音的總和，內心的話語是外在有聲對話內化的結果(internalization of outer dialogue).因此，根據巴赫金的理論，我們可以說獨白亦具有對話性。

有關獨白話語的表述的相關資料如下：

1.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 Geary, James. *I Is An Other: The Secret Life of Metaphor and How It Shapes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HarperCollins e-books, 2002.

本計畫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期間收集相關研究資料，對於計畫的理論建構與撰寫有實質上的幫助。回國後預計將國外所蒐集之資料運用於本計畫的理論撰寫部份，並依原計畫繼續完成其它部分研究。

三、建議

四、其他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09/12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研究
	計畫主持人: 劉心華
	計畫編號: 99-2410-H-004-033-MY2　　學門領域: 俄國文學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劉心華	計畫編號：99-2410-H-004-033-MY2
計畫名稱：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2	4	100%	篇	1. 劉心華，2010.09,〈歷史的傷痕記憶－金斯伯格《險峻的路程》：女集中營回憶錄〉,《文化越界》，第 1 卷第 4 期，頁 97-119。 2. 劉心華，2012.01,〈從主體建構理論探討二十世紀初俄國女作家的自傳體書寫〉,《政大俄語學報》，第 19 期，頁 89-11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1	1	100%		劉心華，2012.10，《她們的足跡:二十世紀俄羅斯女作家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ISBN：978-986-03-3709-9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4	4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教處計畫加填項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已將部份研究成果陸續發表相關論文於期刊，並收錄部分文章於專書《她們的足跡：二十世紀俄羅斯女作家作品研究》中

1.劉心華，2010.09，〈歷史的傷痕記憶－金斯伯格《險峻的路程》:女集中營回憶錄〉，《文化越界》，第 1 卷第 4 期，頁 97-119。

2.劉心華，2012.01，〈從主體建構理論探討二十世紀初俄國女作家的自傳體書寫〉，《政大俄語學報》，第 19 期，頁 89-110。

3.劉心華，2012.10，《她們的足跡：二十世紀俄羅斯女作家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ISBN：978-986-03-3709-9

其餘研究成果亦將繼續撰寫論文發表。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新歷史主義指出，歷史充滿斷層，歷史由論述構成。以傅柯的概念，我們應透過各種論述去還原歷史。換句話說，歷史並不是對史實單一的記載，亦並不是對於過去的事件的單純的紀錄。德西達(Derrida)也說：「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我們都透過這種結構再理解整個世界。因此，文學中的自傳體作品與回憶錄成為研究特定歷史時空的另一種佐證。從這些自傳體或回憶錄的作品，吾人可以拼貼出各時代社會及文化氛圍與圖像。

作者近幾年來持續研究俄羅斯文學中的性別問題，從各個男作家與女作家的不同角度來建構俄羅斯文化中的兩性觀，也發現其重要性。然而，卻發現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在俄羅斯與國外像是被擦拭掉的歷史記憶，呈現失語狀態，相關研究極其缺乏；造成了對二十世紀俄羅斯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某些失落。由於本議題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本

研究計畫之執行有其重要性與現實意義，亦具有其特殊性。

本計畫研究除了發掘二十世紀俄羅斯女性自傳體書寫之特色外，亦拼貼出二十世紀女性視野的俄羅斯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空間圖像。

計畫亦達成下列成果:

1.建立台灣有關俄羅斯性別研究、俄國女性作家研究之資料庫。

2.為台灣學術界在該領域研究奠定基礎。

3.增進國內女性文學、性別研究、文化研究之視野。

4.提昇台灣在該領域研究的國際化水平。